



西安地方志

2013·第2期

(总第221期)

陕新出连内印字第00016号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目 录

我们的村落

南郭村 小雁塔社区居委会 (3)

草场坡村 草场坡社区居委会 (4)

历代名人与西安

凄美的王昭君——和平的化身 (7)

学术交流

试论方志学学术话语体系的建立

..... 张世民 (10)

芸阁学舍与省政当道 王 翰 (17)

人物春秋

西安市历任市长(1984年11月至今) (19)

史料钩沉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20)

揭秘:苏联帮中共与国民党争夺东北的各种
手段 (22)

毛泽东、周恩来的最后一次旅行 (24)

毛泽东曾“警告”彭德怀别造反 (26)

20世纪50年代,中国严打日本“入侵”渔船
..... (28)

西安风情

隋唐长安城门趣闻(十二)——光化门
..... (31)

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 (32)

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

户县曲子 乌云高娃(整理) (33)

文史拾趣

新中国“夫人外交”由何而来? (34)

毛泽东时代的大吃大喝现象	(38)
民国年间如何考清华	(41)
柳下惠:美德远不止坐怀不乱 以说真话闻名 天下	(42)
中国最早四位女留学生的故事(二)	(44)
中国历史上首位外国太监	(46)
志鉴动态	
抢抓机遇 迎接挑战 不断推动我市地方志 事业创新发展	(48)
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迅速传达贯彻全省地方 志办公室主任会议精神	(48)
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启动《西安市地方志志》 编纂工作	(49)
西安市第二轮修志工作培训暨区县志研讨会 召开	(50)
《长安志》校点合作协议正式签订	(51)
《西安市水务志》暨《西安市志·水务分志》 初稿研讨会举行	(51)
知识窗	
“羞”原指有滋味之物	(52)
“清华简”再次印证《尚书》系伪作	(53)
血气方刚说的是中年人	(54)
“蒙古大夫”的由来	(55)
历代诗人咏长安	
春思二首	(唐)贾至 (56)
解字	
“少”	(9)
“兮”	(16)
名句欣赏	
【德之休明,不在位之高下】等五句	(43)

《西安地方志》编辑委员会

主任:冯艳阳

副主任:姚敏杰 任昆明 张 帆

王 莹

委员:崔义萍 杨军亚 彭栋为

高长安 姚文东 崔桂琴

富小云 张 耀 高 鹏

《西安地方志》编辑部

主 编:姚敏杰

副 主 编:高长安

责任编辑:宋亚颖 何彩云

主办: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

编辑:《西安地方志》编辑部

地址:西安市凤城八路 109 号市政府

大院 26 号信箱

邮编:710007

西安地情网:www.xadqw.cn

西安市地情资料信息中心基础数据库

<http://125.76.215.234:8080/difangzhi/>

E-mail:changannan6861@sohu.com

电话:029-86788731

村落是社会的基本组成部分,向上追溯,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祖先生活过的村落。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一个个城中村改造项目或其他项目的实施,加之村落自身的开发等,村落在巨变,部分村落在消失。

为落实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为西安的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服务,经市政府同意,由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负责征集西安村落资料,《西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做好〈西安村落记忆〉资料征集工作的通知》(市政办发[2012]18号)已经下发。我们拟在资料征集工作完成后,编纂出版《西安村落记忆》(上、中、下),同时在“西安地情网”上开设相关专栏,留存西安村落资料,宣传西安村落。

本刊开设“我们的村落”栏目,目的就在于,配合该项工作的开展,讲述西安各个村落的发展轨迹,唤起记忆,畅想未来。



城改前(南郭村)

南郭村

位于西安市南门外南稍门十字(解放前叫贺家坟十字),南临南关新村,东临西安市卫生学校,北临环城南路,离古城大南门约1公里,因位居城南而得名南郭村。

据村里老人讲,最初南郭村是由几户来自河南、湖北等地逃难的杨姓、张姓、黄姓难民形成的。最初属长安县管辖,民国时期设保甲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建立区乡制度。1951年成立互助组、变工队。1957年实行

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后又成立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建制。1958年10月成立人民公社,属永宁人民公社管辖。称建中生产大队,下设四个生产队。改革开放后改回南郭村,属碑林区农副业局管辖,保持原大队体制不变。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城中村的经济结构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城中村改造也应运而生,2006年6月30日村民户口由农业转为非农业,走出了城中村改造四个转变的第一步。2008年9



城改后(南郭村)

月正式撤村成立小雁塔社区居委会。

南郭村的农业生产开始是半粮棉半蔬菜,随着城市建设推进,耕地的减少,而转变为蔬菜生产。改革开放后政府重点支持农村开展副业生产及第三产业,搞活经济提高村民收入,改善村民生活水平。先后成立“豆腐

厂”、“建中旅社”、“秦都饭店”、“小雁塔饭店”、“建一食堂”、“建二食堂”等村办企业,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村民的收入,但终因经验不足,管理不善,最后都以关闭收场。因此出租经营场地收取租金也就成为村集体的主要经济收入。积极配合,按照政府政策的要求自我改造,建成“秦埔公寓”、“西宝花园”等安置楼,改善村民居住条件。

该村历史虽不长,然而也不乏出类拔萃者,突出的有解

放初期的省级劳模杨国谋,改革开放时期的杰出青年“三秦之子”、碑林区人大代表肖惠民,更有2000年悉尼奥运会男子体操团体冠军成员肖俊峰等。

(小雁塔社区居委会)

草场坡村

位于陕西龙脉长安路立交桥的东北角,东临永宁路,南临南二环,西临陕西省工业展览馆,北临三五三八厂。占地面积约72亩,2010年有427户,1012人,其中男性398人,女性614人,32名党员。最年长者94岁。

据史书记载,草场坡唐时为长安官马草

场。宋人张礼《游城南记》记“草场坡在永乐坊,即横岗之第五爻也”;元代骆天壤类编长安志载“在朱雀门外,乃旧之草市,有坡故曰草场坡”。

该村历史悠久,具有很深的历史积淀和文化底蕴,在明朝大规模的移民中,卢、齐、李、刘等姓氏村民,告别山西临汾的大槐树,

背井离乡迁徙而来，在此安家落户、繁衍生息。1947年隶属西安市第九区，第十一保；1949年5月隶属西安市第九区第五乡驻夏家庄，1955年隶属雁塔区李家村乡，1966年隶属西安市郊区，1980年隶属西安市碑林区永宁公社，1990年隶属西安市碑林区。

解放前，大部分村民以种粮食和小买卖为营生。曾有国民党的汽车队在村中驻扎过，停车场占村子30%面积。

解放初，全村共有可耕地1000多亩。之后有上千亩土地被国家征用。村北省旅游局、电信局，村西体育场、工业展览馆，村东三五三八厂、干休所，村南公路学院（现长安大学）以前都是草场坡的土地。

20世纪60年代初，国家遭受三年自然灾害，粮食供应非常紧张，老一辈开办第一家豆腐加工厂和粉条厂，从业人员近百人。同时大力发展养猪业，以此换取粮食来解决温饱。老人们谈起豆腐厂、粉条厂深情地说“豆腐加工

厂、粉条厂救了草场坡人的命”。

20世纪80年代初期，村民主要从事蔬菜种植。随着土地面积的减少，转而大力发展村办企业。首先办起了草场坡村旅社，拥有上百张床位，停车场、食堂等设施齐全。随后又办起了机床厂、电瓶厂等。随着副业的发展，村中集体经济不断增加，当时村民的日劳动价值达到人民币七元，在南郊首屈一指。1985年，陕西经贸委的下属企业征用本村土地建成陕西省工业展览馆。利用征用土地的钱，相继又办起了钙塑板厂，经编厂（后更名为长安路针织厂），长安路贸易货栈（后更名为海燕商店），汽车修理厂，农机修造厂。1986年初，又与西安市华通食品厂在村南边以联建的形式开办了西安市万里食品厂，占地7亩多，投资300万固定资产，从业人数达100多人。所生产的饼干销售整个西北地区并远销俄罗斯，在西安市食品生产行业享有一定声誉。

20世纪90年代，随着社会的进步，城市现代化的发展，西安市修建二环路，近80亩土地被国家征用，村办企业均被拆除。村民开始发展个体经济，在自家宅基地上，将原来的一、二层房子加盖到四至五层，进行房屋出租。全村门面房近千间，有招待所、旅社40多家，大型网吧3家，超市、理发店、菜市场、幼儿园、医疗站等应有尽有。大量流动



城改前村貌(草场坡村)



城改中(草场坡村)

以上的村民会议,同意将村委会转为社区委员会,9日整体拆迁。2009年5月11日,社区居民委员会正式挂牌。

自村西南角到东北角,有一条斜插而过的地裂缝。20世纪90年代初,村内出资对地裂缝进行勘查,由于对地下水的不断开采,地裂缝仍处于

人口居住在此,使村民收入大幅度增加,有的购置出租车搞营运、购私家车用于对外租赁。

在发展村民个体经济的同时,村内集体经济也开始发展。经多方努力,在原村办旅社的土地上与西安市百汇商务发展有限公司联建百汇市场。在二环路建设返还的土地上,与陕西西部招商投资有限公司联建西部招商广场,村内拥有9000平方米建筑房屋,出租给陕西瑞晨投资有限公司。

深厚的历史渊源,造就了草场坡村的人杰地灵,人才济济。草场坡人重视下一代的教育,自恢复高考以来,先后有近百人考上一本、二本、研究生乃至出国留学。

2006年6月30日,碑林区城区内的15个村庄将村民的农业户口一次性全部转入非农业户口,将村内所有的资产进行清产核资,股份量化到每位村民名下,村民成为股东。2008年11月6日,在村水房召开全村18岁

活动周期,导致一些村民的房屋出现裂痕。

草场坡铜乐打击乐已有上百年的历史,据说在解放前就有开庙会的习俗,每逢庙会、春节都要热闹一番,加上秧歌队,上至七旬老人,下至十多岁的小孩,阵容有上百人之多,深受村民及各界的喜爱。

(草场坡社区居委会)





凄美的王昭君 ——和平的化身

王昭君,名嫱,字昭君,西汉南郡秭归(今湖北省兴山县)人,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一。生活在长安城时默默无闻,从长安城走出时已然成名,后来则流芳百世,留下许多传奇。

王昭君之美,有三件事可以佐证。

一、“娥眉绝世不可寻,能使花羞在上林”,其绝世才貌,顺着香溪水传遍南郡,直至京城。公元前 36 年,汉元帝昭示天下,遍选秀女,王昭君成为南郡首选。

二、在王昭君主动要求充当和亲者赴匈奴时,“丰容靓饰,王昭君光明汉宫,顾影徘徊,

徊,竦动左右。帝见大惊,意欲留之,而难于失信,遂与匈奴。”(《后汉书》卷八十九《南匈奴传》)此间还有一著名传说:汉元帝回到内宫,越想越懊恼。于是叫人从宫女的画像中拿出昭君的像再看。模样是有点像,但完全没有昭君本人那样可爱动人。为此而迁怒于画工毛延寿,一气之下把他杀了。原来,宫女进宫后一般不能与皇帝直接见面,而是由专门的画工画了像,然后送到皇帝那里,看画选人。而毛延寿以此为已谋利,宫女若送点礼物给他,他就画得美一点。而王昭君不愿送礼,毛延寿自然不会把她的美

貌如实地画出来。

三、被尊为中国古代四大美人之一,有“落雁”之誉。相传,在告别故土、登程北去途中,王昭君于坐骑之上拨动琴弦,奏起了悲壮的离别之曲。南飞的大雁听到这悦耳的琴声,看到骑在马上这个美丽女子,竟然忘记摆动翅膀而跌落地下。由此,王昭君得来了“落雁”的美称。

但王昭君又是凄婉的。想当初,小小年纪,离开家乡和父母,远赴长安,途中艰辛可以想见;宫中的女子,能够得到皇帝宠幸也许



是她们一生的愿望。但是，风华绝代的王昭君在宫中并没有得到皇帝的宠幸，以致沉寂多年，自然落寞和悲伤；万般无奈中，她主动要求充当和亲者。但是，远离故土和亲人，心里的矛盾和斗争只有她本人最清楚。

就是这样一位看似柔弱、娇美的女子，却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汉宣帝时，匈奴贵族争权夺利，五个单于分立，且攻打不休。其中，呼韩邪单于被他的哥哥郅支单于打败后，决心到长安与汉朝和好，汉宣帝不但亲自到长安郊外迎接他，而且为其举行了盛大的宴会。呼韩邪单于在长安住了一个多月后，汉宣帝派两名将军带领一

万名骑兵护送他回到了漠南。呼韩邪单于十分感激，一心与汉朝和好。见此，西域各国也都争先恐后地同汉朝打交道。汉宣帝死后，汉元帝即位。匈奴的郅支单于侵犯西域各国，而且杀了汉朝派去的使者。于是，汉朝派兵打到康居，杀了郅支单于。郅支单于一死，呼韩邪单于的地位稳定了。

公元前 33 年，呼韩邪单于再一次到长安，要求和亲。汉元帝答应了。这里有一点需要特别说明，起初，汉朝是挑选公主或者宗室的女儿，去与匈奴和亲。但是，随着汉朝的逐渐强大，汉元帝决定挑个宫女送给呼韩邪单于，并且吩咐人到后宫去传话：“谁愿意到匈奴去，皇上就把她当公主看待。”后宫的宫女都是从民间选来的，进了皇宫，她们就像鸟儿被关进笼里一样，都期待着有一天能被皇帝所幸，或被放出宫去。但是，若要离开本国，背井离乡到匈奴去，却又不乐意。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王昭君挺身而出，自愿到匈奴去和亲。

王昭君赴匈奴后，做了呼韩邪单于的阏氏（音 yān zhī，匈奴皇后号），被封为“宁胡阏氏”，呼韩邪单于希望她能为匈奴带来安宁和平。在匈奴，王昭君时时劝呼韩邪单于不要发动战争，而且把中原的文化传给了匈奴。在此后 60 多年里，匈奴和汉朝和睦相处。史书有云：“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忘干戈之役。”应该说，当时汉朝与匈奴之所以有长时间的和平与交流，王昭君着实功不可没。她宛若一名和平天使，为当时的民族团结做出了伟大贡献。

当呼韩邪单于去世后，王昭君深明大

义,以非凡的气度,入乡随俗,从胡俗而再嫁呼韩邪单于的大阏氏长子。从另一个层面讲,她也是迫不得已,牺牲自己而换取双方的长久和平。

王昭君是一名和平的使者,她的这种人性光辉也被她的子女所继承。王昭君在匈奴生一男二女,王昭君死后,她的女儿须卜居次云和女婿须卜当,仍秉承其生平之志,继续为汉匈两族的和平友好而努力奔走。

昭君出塞早已成为历史,但其非凡的壮举和不灭的历史功绩却为中华民族所牢记。

在王昭君的出生地湖北及其生活和长眠的内蒙古自治区,当地政府和民众以多种方式缅怀这位伟大的女性,同时也为当地旅游业的发展寻找到了历史线索和文化渊源。

据统计,古往今来,反映王昭君的诗歌有700多首,写过其事迹的著名作者有500多人,古代有石崇、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张仲素、蔡邕、王安石、耶律楚材等,近现代有郭沫若、曹禺、田汉、翦伯赞、费孝通、老舍等。作为一名历史人物,得到如此多名家的垂青,实在不多见。

• 解字 •

“少”



①



②



③



④

“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这个“少”字本为指事字。上古“少”与“小”通用。①是甲骨文,仅四个小点,表示不多。②是金文的形体,是在“小”字的基础上再加上一撇(指事符号),仍表示不多。这一撇是撇向右,在甲、金文字中左右反正往往无别。③是小篆的形体。④为楷书的写法。

《说文》:“少,不多也。”这个“不多”正是“少”字的本义,如《孙子兵法·谋政》:“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大意是:敌我兵力相当,就能打败它;兵力少,就要避开它。由“不多”义可以引申为“稍微”,如《战国策·赵策四》:“太后之色少解。”也就是说:太后的怒色稍微和缓了一些。

请注意:“少”字是个多音多义词,当读 shao(哨)时,一般是指“少年”、“青年”,如孙过庭《书谱》:“老不如少。”即“老年不如少年”的意思。至于《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所说的“少腹痛”,那是指“小肚子痛”。可见,“少”可做“小”的通假字,在“大小”的意义上,“少”可代“小”而用。

试论方志学学术话语体系的建立

◎ 张世民

(接上期)

四

我们要重新建构和塑造当代方志学学术话语,就必须从中国区域社会和当代方志学的实际出发,确立这一学科建构的现实基础;同时又要吸纳传统方志学和西方历史学的思想理论遗产,从而确立这一知识建构的逻辑起点。只有将当代社会发展的逻辑性和历史性统一起来,才能塑造当代方志学学术话语的时新语范。之所以强调吸纳传统方志学,并不是说当代方志学在建构过程中不曾吸纳过这些学术遗产。相反,在20世纪的三个历史阶段,方志学都曾不同程度地吸纳过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但由于不同时期的学术祈向有所差异,因而在今天看来,过去所扬弃者未必皆糟粕,过去所继承者未必皆菁华。特别是在生吞活剥近代西方学术话语语范的同时,中国方志学原有的自家优长和学术个性也一度被湮灭、被放弃,地方志著述的学术特色愈加粗疏化,这也是需要慎重对待的一个现实问题。

我们之所以强调吸纳西方学术话语,目的不啻是借他山之石,攻我之玉,此即参照西方学术话语的语范、语法来改造、重塑传统学

术话语体系。百余年来,在欧风美雨交相激荡的岁月里,人们为了学习和师法西方学术语范,竟然大有全方位地放弃改造与吸纳中国传统学术语范的架势,因而方志著述的社会内容更新和表达方式相对滞后,这也使地方志著述的传统优长和独特个性被消解殆尽。尤其是在思想教条主义盛行时期,贴标签式的、决断性的学术话语,其实早已沦为政治话语的婢仆,方志学也像缺钙的软骨儿一样无法保持独立的学术禀赋。

有鉴于此,我们认为,方志学学术话语的科学建构,既需要严谨认真的考证精神,更要有宏大叙事的思想勇气。方志学学科语范的建设,既要注意吸纳地理学、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民族学、民俗学等诸多人文社会科学的内在精髓,又要重视重建在现实社会基础之上的思想形态和学术语态。方志学不能永远站在学术的边缘,还要问津当代社会的核心价值观;方志学不仅要随时代前行,而且要在一定的公共管辖领域,转换时代观念,引领社会进步。倘若在方志学学术话语中缺失了观念创新、思想赋予和学术自主等普适性权力,有关方志学学术话语的论题,就丧失了现实的针对性。

五

方志学学术话语的建构,不可以徒托空言,凿空立论,而要与地方志编纂与研究的社会实践相结合。方志学学术话语的现实针对性,对于不同规格、不同语范的地方志书是有所不同的。尤其是在地方志著述日益浩瀚,其学术话语空间日益拓宽的今天,充分认识理论的现实针对性,也是方志学学科理论建设的重要标志。

就地方志编纂的学术空间而论,既有传统国家的一统志,又有分省的会通志,以及市县的区域志。从理论上说,地方志是有关区域空间和时间的学术平台,其地理属性和历史属性缺一不可,但在现实中,地方志的空间跨度和时间深度均有所差异。省志大都是多卷本、会通志,其行业性更强,管理属性远远高于实体属性;而市县志大都是单卷本(市志也有多卷本),其区域性更强,实体属性更高于管理属性。这种内涵差异,也影响到志书的现实针对性。

比较而言,省志和市县志的重大差异,正在于管理属性和实体属性孰大孰小、孰强孰弱的问题。事实上,管理属性较强的省级志书,具有广泛的普适性;而实体属性较强的市县级志书,则具有相对的特殊性。

就内容而言,省志居于较高层位,在专业深度上更甚一层,业务的针对性也较为深入;而市县志居于较低层位,在部类综合上独擅胜场,区域的针对性也较为强势。两者的不同层位和特点,直接影响到方志学学术话语的具体表达方式。其中市县志具有更强的基础

性、更实的区域性,所以其著述上的实体性要求更高一些。

近年来,方志学界有关地方志书内容的部类划分有所讨论。笔者认为,这一讨论,应该重点落脚于对市县志书进行整体分析的基础之上。根据地方志的表达形式和基本内容来划分,地方志著述特别是市县志部类划分,大体有来自形式划分的通项部类和来自内容划分的专项部类两个方面。

所谓专项部类,是指在社会分工的基础上,可以由各级党政机构或专业部门承担的地情资讯。内容包括自然(地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等六个部类。其中自然地理内含自然环境、自然资源和自然灾害三个方面;政治部类包括党群组织、政权机关和政务活动三个层次;经济部类涵盖经济实体和经济管理两个方面,其中经济管理有宏观经济管理、专项经济管理和特殊经济管理;经济实体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划分,既有农林牧渔业,也有工业、商业和其他社会组织,其中工业中又有采掘业、制造业、服务业等;军事以记述军事活动为主,包括军事地理、军事组织、驻军、兵役制度、民兵、人民防空、战役战例等内容。另外,涉及文化、社会部类的内容,其涵盖面更广,其内容更细,仍有许多需要深入探索的内容。

所谓通项部类,是指各个专业部类记述均可用到的贯通性内容。内容包括人物、事件、文献、图照、概述、索引六个部类。其中人物有人物传、人物录、人物表三个层面,人物

●学术交流●

传常用于记载过世人物,人物录、人物表用于记载健在人物,但人物录未必比人物传短。事件有大事记(大事编年)、重大事件纪事本末及行文中以人系事等。文献包括輿情文献、法规文献和艺文文献等,可以采取全文照录、摘要处理或剪辑征引等方式加以记载。图照包括地图、照片和表格等,其中地图处理必须遵循国家有关地图编审的规定,不可随意处理。概述亦有全书之前的总述、综述与各篇之前的简述、分述之分。索引涉及地名、人名、事件名、制度名和文献名等,也是著述规范化的学术标志之一。

对于上述十二部类的学术划分和专门研究,乃是重建方志学学术话语体系的重要内涵之一。由于各个部类的特殊性,有的需要集中表述,有的只能分散处理,大都可以在篇目大纲中找到具体的针对性。由此,篇目设计和著述框架的形成和完善,也将成为方志学学术话语体系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

首先要强调的是,地方志著述中的部类划分,牵扯到不同时期人们对于现实社会的不同解读。历史上,有过“七十二行,行行出状元”的概念,这七十二行,其实是宋元以来历代王朝对于各种社会组织、各个社会行业的有效分类。尽管我们如今无法确切还原七十二行的全部类别,但根据当前我国《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社会上各个行业、各种门类仍处于不断调整、变化之中,究竟能否找到古今社会的互动认识空间,仍然是地方志工作者需要做出努力的一个方面。比较而言,明清志书所存在的某些残缺和漏洞,完全可以参

照这个划分部类的学术标准加以补充和更新。因而方志学学术话语体系的建立,既要注意到话语方式本身,更要注意话语内容的随机更新和现实语境的历史转换。

其次,对于专项部类和通项部类的具体研究,笔者另有专门文章,但就形式而言,所谓通项部类也可叫做通项门类,其实质是对于各个专业部类记载方式的科学剖析。因为从理论上说,地方志记载人物、事件、文献、索引等内容,是再寻常不过的事情。但在实际中,对于这些内容的记载,都必将牵扯到相关的记录标准和历史评价,尤其是尚未盖棺定论的历史人物,究竟怎样评价也都是相当棘手的现实问题。同时,对于重大历史事件的编年记载,涉及大事、要事、新事、特事等等,也不必采取单一大事记的办法囿囿处理,而要确立不同事件的收录规格与共享标准,某些重大事件尚需专门介绍。地方志书的专项部类中,都将用到通项门类的基本的处置方式,所以它的工具性更强一些。

第三,从方志学学科话语体系的建立角度来说,志书内容的调整和表达形式的转变,也会影响到地方志书的资料采撷和语境变换。采取上述十二种部类分析法,有助于对地方志书(尤其是市县志书)基本内容的规范化、标准化认识,有助于我们提高志书的整体学术质量并吸引人们对于现实社会问题的深度关切。清代乾嘉学派的地方志著述,过于侧重地理沿革,对于社会问题关注不够;而历史学派的地方志著述,侧重了历史资讯却忽视地理沿革,其记载上的缺陷也时有发生。有鉴

于此,笔者认为,通过地理——历史内容的互动,根据中指组《地方志书质量规定》的学术指引,采用科学的部类划分法来完善地方志著述的基本内涵,乃是很有必要的。

六

建立地方志学术话语体系的关键是确保地方志著述的学术质量。而在鉴识层面上,地方志著述的学术质量主要体现在科学的评稿审稿方面。这也是建构当代方志学学术话语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地方志书的评稿审稿问题,是从事地方志编纂工作和行业管理的人们经常要遇到的事情。编纂者可能被别人审查,而审查别人的志稿也存在是否被认同的问题。从评审心理上说,被审查、被发现问题总让人不愉快,除非被肯定、被褒扬,否则被别人评头论足,总是会自感愧疚。而审查别人的志稿,倘若缺乏设身处地的认同心理,也许会大加挞伐,结果让人心理上承受不了。所以,在很大程度上,审稿和被审稿两者之间的关系,其实是一道志稿质量是否可以过关的关系,尽管其根本目标完全一致,都想将志书的学术质量加以提升,但站在对方立场上来审视问题,首先就有一个与人为善和从善如流的态度问题。审稿者要讲道理,而且道理要充分,有根据,有较强的可操作性;被审稿者也要宽怀一些,豁达一些,允许人家出错。建立在这个学术基础上的编审对话,才是具有建设意义的、积极的学术对话。

地方志的审稿要讲求必要的技巧和方法,但是运用这些技巧和方法,目的只在于更好地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因此我们必须用

与人为善的态度,让受审查者有一个乐观的、健康的情绪,愿意在明白存在的问题之后有所更张,有所修改。人常说:话有三说,巧说为妙。这个“巧”是指一种技巧,更是指一种表达的艺术,一种让人如沐春风的对话方式。人又说:话到口边留三分。意思是说,不要说话太满,而要留有话语余地。站在审查者的角度,你所发现的一切问题,都有可能受制于个人知识和认知视野,无法像编纂者那样入乎其中,出乎其外。属于编纂者疏忽大意的方面,适当指出其存在的问题,当然是可以理解的。

如果是另一种表达方式,则应该允许存在。地方志的审稿尽管通常采取批评的方式、提问题的方式,但绝不是要让编纂者的思路和想法跟审查者完全一致,而是要确立一种基本的、客观的公共立场和公共标准,让编者、审者和读者都具备一种可接受的、共同的沟通方式。

地方志著述要力求科学化、规范化,就必须加强业务监督和学术批评。地方志系统建立的审稿制度,其实就是进行业务监督和学术批评的重要手段。志书出版之前的学术批评主要采取审稿方式,志书出版之后主要采取评论方式。比较而言,地方志书的审稿制度和审稿倾向,既是方志学学术话语体系建设的必要环节,更是确保地方志书学术质量的最关键的工作步骤。

就地方志书的审稿模式看,至少可以划分为三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对于所有篇章的内容提

●学术交流●

出一些具体的意见。可以逐章逐节、逐段逐句提出意见,甚至直接指出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当然,这些意见往往是针对编纂者的分歧意见,或者总纂力度不足,或者资料缺陷严重,或者语言表达疏失,或者体例不合规范等等。这些具体问题的提出,是提意见的方式,更是寻找最佳记载方式的学术对话。意见不厌其细,关键在于有无可操作性,有无学术价值。

第二个层面,是要对类型性的意见加以学术概括。可以从政治立场、资料建设、体例规范、文字表达等不同角度,对所有的意见加以逻辑化、系统化整理。地方志书的审稿意见,一定要重视硬伤问题的处理。硬伤多指常识性的错误,是内行表述和外行表述的刚性界限之一。尽管某些常识性的问题会随时变化,务必因地制宜,不断调整,但就一般情况来看,对于常识性的问题仍应特别慎重,低级的、技术性错误更应加以避免。与此同时,地方志著述的表达上也常常有一种软伤。诸如用语程度不足或过分,资料火候不足或过滥,体例偏差或疏失等等。地方志书对一个问题处理,常常出现认识广度、深度、角度和尺度的问题,在话语程度的把握上具有较大的弹性,这也是判断入门菜鸟和行家里手的一个重要砝码。一般来说,技术性硬伤容易在编校质量检查中发现和更正,而思想性软伤则需要更高的学识水平和更深的学术眼光来鉴别、来判断。地方志的审稿水平,也存在这个方面的差异。

第三个层面,是要充分提炼修改意见和

建议。地方志书的修改意见,可以是具体的、知识性的,也可以是抽象的、理论性的。在编纂阶段,这些修改意见常常是资料性、微观性的,某些对体例的意见也将在动态中得到解决;在审稿阶段,这些修改意见常常是总纂性、宏观性的,尤其是思想性总纂和技术性总纂,解决问题的角度完全不同。技术性总纂主要解决硬伤,而思想性总纂主要针对软伤。两者意见有所差异,也有内在的联系性。审稿建议越具体、越细致,越有可操作性,但是编纂者也不可就事论事,还要举一反三,解决审稿者尚未发现或尚未罗列的问题。

地方志书的审稿要讲求熟悉的原则和通识的要求。地方志的审稿者,一般来自两个方面的专家:一方面是行业性、地域性的专家,他们对特定的地方志书所记载的各种历史事实,有比较清楚的了解,也可以发现亲身经历和直接见证的一些历史事实;另一方面是专业性、技术性的专家,他们对于地方志的著作体裁比较熟练,可以灵活处理一些需要记载的历史素材,至少能够帮助编纂者找到更好的记载同一历史素材的著作方式或表达口径。就前者来说,当然是身处其中、熟悉情况的人最好。真正意义上熟悉庐山的人,绝不是山外来客,而是山中主人。尽管他们也有熟视无睹、置若罔闻的地方,但总比山外来客更加洞悉,也能够在特定的语境中找到最恰当的表达方式。就后一种专家来说,只要熟悉这种学术表达的基本范式,也就可以提出较好的科学建议。

地方志书的审稿要分层次、别远近,只有

适度距离有望产生对问题的更全局、更整体的认识,具有一定的超脱性、审美性。一方面,受制于具体的环境和习惯的语境,距离太近、关系太密切经常会出现某些“灯下黑影”的问题;另一方面,距离太远、关系太疏远又将是隔岸观花,毫无针对性。从密而疏,也有个渐进式的审视过程。针对纳入国家规划的市、县两级志书,陕西省地方志系统确立了省、市、县三级审稿制度,其中初审以审定内容为主,复审兼具审定体例和内容,而终审以审定体例为主。这个三审终审制,对于确保当代地方志著述的总体内涵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地方志书的审稿要把握的学术关口不止一端。这种学术关口,学术界常概括为政治关、体例关、资料关、文字关等,其中政治关居于首要的地位。所谓政治关,就是要看地方志书政治上是否合格,是否资治为用。在我们这个高度强调政治性的国度里,这恐怕也是一道考量其承载当代社会意识形态水准的重要关口。对于政治关的把握,关键不在于贴标签,而在于用正确的思想观念来审视社会现象。有人说,地方志的编者都是陈闻记者,似乎陈闻记者就可以放任手足,不必关切当代社会问题。其实,不管是新闻记者还是陈闻记者,都有一种设身处地的问题,都有一种用当代人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来重新审视一切社会现象和历史现象的问题。不管是对社会现象还是历史现象的记录,都将体现出当代人的社会本质,而不是钩沉当事人的社会本质——因为随着历史当事人的代谢,根本就不存在所谓历史本质。有鉴于此,所谓把

好政治关,其实是用辩证的、发展的眼光来认识问题,判断问题,将纷繁驳杂的社会现象化为历史符号,让人们产生一种擦拭了的历史的镜子的观照心理。

政治关的把握,关键是要不断解放思想,与时俱进,调适过时语境,提炼时新理念。一方面,是要对于过去的社会观念进行审读,进行必要的学术剥离。一般来说,编纂者善于接受新事物、新观念,在地方志著述中就能够体现时代精神,贯穿时新理念;反之,就可能用陈旧的观念来审视问题,得出不符合社会现实的结论。不同年龄梯次的人们,对于问题的认识会产生深度差异,年龄越大,阅历越深,其所产生的社会观念越有深度,越有一种穿越现实生活的纵深感,让年龄大的人来撰写地方志书,来审查地方志书,肯定会有来自个人感受、具有亲切感的评价优势。但是也存在着是否掌握最新社会动态,是否具有时代感的再学习问题。历史上,尤其是改朝换代之后,不少地方志书渗透出某种遗老遗少的观念,也就说明了这一点。

另一方面,则是要对地方志书所葆有的政治立场进行政治判断。地方志书有其特定的政治—社会立场,这种政治——社会立场可以是民族的、国家的,也可以是党派的、私人的。我们强调地方志要“为国修志,传承文明”,就是要强化民族的、国家的立场。地方志书是职务作品,是官书。我们不强调官样文字,但官方著作的权威性不可丧失。地方志著述并非个人著作,不能用私人观点代替社会通识,更不能蝇营狗苟,假公济私,在公共载

●学术交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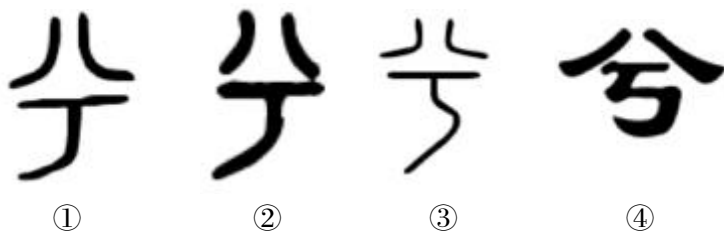
蒙到发展,都涉及到我们这个民族对于人类社会特别是区域社会的基本认识,尤其是百余年来,随着当代地方志编纂事业的发展演变,方志学学科建设也经历了几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同时,对于方志学学术话语的时代创新,离不开地方志的编纂实践,离不开对于实体性较强的、基础性志书的部类分析和专题研究。在地方志书的学术质量保障体系中,如何提高志书的整体审稿水平,在审稿把关方面都要注意哪些现实问题,也是值得探讨的理论话题。可以肯定,用科学的、系统的学术理念来探讨当代方志学学术话语体系的重建问题,不但会反馈于地方志编纂工作的具体实践,而且会影响到当代地方志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对此加以研究的必要性是毋庸置疑的。

蒙到发展,都涉及到我们这个民族对于人类社会特别是区域社会的基本认识,尤其是百余年来,随着当代地方志编纂事业的发展演变,方志学学科建设也经历了几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同时,对于方志学学术话语的时代创新,离不开地方志的编纂实践,离不开对于实体性较强的、基础性志书的部类分析和专题研究。在地方志书的学术质量保障体系中,如何提高志书的整体审稿水平,在审稿把关方面都要注意哪些现实问题,也是值得探讨的理论话题。可以肯定,用科学的、系统的学术理念来探讨当代方志学学术话语体系的重建问题,不但会反馈于地方志编纂工作的具体实践,而且会影响到当代地方志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对此加以研究的必要性是毋庸置疑的。

蒙到发展,都涉及到我们这个民族对于人类社会特别是区域社会的基本认识,尤其是百余年来,随着当代地方志编纂事业的发展演变,方志学学科建设也经历了几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同时,对于方志学学术话语的时代创新,离不开地方志的编纂实践,离不开对于实体性较强的、基础性志书的部类分析和专题研究。在地方志书的学术质量保障体系中,如何提高志书的整体审稿水平,在审稿把关方面都要注意哪些现实问题,也是值得探讨的理论话题。可以肯定,用科学的、系统的学术理念来探讨当代方志学学术话语体系的重建问题,不但会反馈于地方志编纂工作的具体实践,而且会影响到当代地方志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对此加以研究的必要性是毋庸置疑的。

·解字·

“兮”



“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困兮?”这个“兮”字本为指事字。①是甲骨文,线之上的两点是指事符号,表示说话时声音自口中发出。②是金文的形体,与甲骨文相似。③是小篆的写法。④为楷书的形体。

《说文》:“兮,语所稽也。”“稽”本为“停留”的意思,这里是指声音延续义。“兮”字是语气词,古代多用于诗赋的句中或句尾,和现代汉语的“啊”、“呀”相仿,如刘邦《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诗经·卫风·硕人》:“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倩:笑靥美好貌。盼:转目时黑白分明。)不管在句中还是在句尾,均可以译作“啊”或“呀”。



芸阁学舍 与省政当道

◎ 西北大学 王 翰

芸阁学舍为关学最后一个重镇，系巨儒牛兆濂先生所创，亦随牛兆濂先生病歿而废匿。其址初在蓝田三里镇东孙真人祠，旋迁左近之牺母庙（亦称圣母庙），辛亥鼎革后，得兴平张元际先生建议与倡捐，再迁建于不远之四献祠（吕氏庵），即宋代邑贤吕大中、吕大端、吕大临、吕大防昆仲祠堂，遂为定址并初具规模。

学舍为先生一生事业所系，亦先生晚年托命之所，其设帐授徒于此，寿终正寝于此，其事业鼎盛人生荣耀亦皆根植于此。学舍“始基”虽得学友倡捐和方伯臂助，也实与当时省政当道，即督军陈树藩、省长刘镇华先后巨款支持，不无关系。先生晚年所著《芸阁学舍记》，曾浓墨以记其事：

政变后，吾友茂陵张元际会讲过此，谓此祠乃关学所系，不可缓，偕弟元勋倡捐督修，即祠为兴学地，美哉！始基之矣。己未岁，兆濂伴读其中，而李知事惟人莅止，慨然以兴学为先务，乃自捐廉俸，请之上台陈督军树藩，为拨巨款。未及兴工，刘省长镇华继之先后拨

款，数又倍焉。于是添建庠舍，式廓崇基，而芸阁学舍于焉托始。

足见两人对先生的礼敬和对关学、对传统文化的重视。翻开吾陕历史，此二人一个曾以盗卖昭陵六骏和谏袁（世凯）附段（祺瑞），导致靖国之役而声名狼藉；一个曾以“祸陕”著称，并因上演围城痛史被绑在历史耻辱柱上，注定都是史上不被待见的人物。然而历史是复杂的，人亦有其多面性，大恶未必尽恶，大善亦未必尽善。二人都有不可洗褪的污点，也都有值得记住的闪光之处。他们都曾是反清的革命志士，都曾参加过陕西的辛亥革命；他们都以统兵攻城略地而出名，却都有相当



●学术交流●

的文化修养,而且都注意笼络文化人士,都对兴办教育有特殊的兴趣并留下了言说不尽的历史话题。前者任中创办西安私立成德中学,又以承认成德中学为燕京大学附属中学,每年保送 50 名成德毕业生就读燕京大学为条件,将其为乃父在北平所购置扩建的肄勤农园(一作勺园),以其父名义低价让渡给了燕大;后者任中以“灌输学识,增进地方文明”相号召,通电声明“将全省商税 35 处统作学校用途,无论军政各费如何艰窘,丝毫不得挪移”,一再组织国内著名学者来陕讲学,并积极筹划,重新创建“国立西北大学”。且不说其动机纯否和史上评价如何,但兴办教育总不失为一桩善举,客观上总比乱兴土木、恣意挥霍效果为好。其赙续于芸阁学舍的鼎力扶持,要之亦与这个基本的背景有关。就中缘由,可能与关学的影响和兆濂先生的名气不无攀扯,也可能与芸阁坚持的尊孔读经主张和其个人的治政需要相与吸引,但其结果却是末世关学几年有限的“繁荣”,史上不绝于书。

兆濂先生操守方正,进退自有格局,从不夤缘攀附,也不为权势而轻易其志。“升中丞抚陕西为师范延教习,必欲得蓝川,蓝川闻命坚辞;复使毓观察即其家请,蓝川预约必守先师规矩,乃允其请,就职无多日,旋以与藩宪不合即辞去……陈督军柏生、刘督军雪亚素重蓝川名,先后帅兵弁、具厚币造庐往谒,蓝川饭以脱粟,却其贻币。杨虎城为主席,具礼请蓝川备顾问,亦作书婉转谢之。康南海于某岁到陕,达官贵人及文人学士莫不欢迎,刘督

军遣使请蓝川赴省陪康某,蓝川托疾辞避,不与之接。”(孙迺琨《〈蓝川文钞续〉序》)但由其《学舍记》对学舍增修过程叙述的口吻,和其文末将此二人张元际、李惟人统一视作“增新诸贤达”观之,先生明显是对陈、刘两位的臂助充满感激的。此人情之常,原无足怪,而此文写于刘氏“解组以去今且十余年矣”的大约 1935 年前后,此时社会于陈、刘之恶评,已成定谏,先生《续修蓝田县志》卷三《纪事》记刘 1926 年围城扰县之事,既称“刘镇华围西安,后防司令部驻县供给前方饷糈,民不堪命。十月败退过县,又被抢掠”,客观记述而无一字恶语,此处犹且如此笔之,的确难得,恰足以反映出先生学者的谨严、做人的厚道和不轻易随俗俯仰的一面。陈树藩姑且不说,由此想到坊间长期盛传刘氏久围西安不下,问计先生的那些故事——先是避而不见其亲兵,继而让亲兵捎回二斤牛肉几咕嘟生蒜(暗示其慢慢熬着)。及至刘本人亲造芸阁,又提前给学生放假,回新街老家去了。等刘赶到其老家,又在门口栓一大狗刁难,并当面让其“我家门前仅一犬守之,将军尚不得入,西安城墙高大坚固,且又有‘二虎’守卫,将军如何能破?!”留其吃顿糝糝面暗讽其收兵散伙,思之总觉不大对窍。意其即使不满刘的围攻西安,对之有所暗讽,但尚不至于倨傲如此,冷淡如此,更不至于无所顾忌地一再耍弄之。坊间所传,信口附会,涉嫌演义,旨在神化先生,丑化“雪帅”,精彩固然精彩,其实不过游谈过过嘴瘾而已,姑妄听之可也,根本不足凭信。

●史料钩沉●

现；同时希望中国国民党断然抛弃依赖外力及专力军事两个旧观念，十分注意对于民众的政治宣传，勿失去一个宣传的机会，以造成国民幸福之真正中心势力，以树立国民革命之真正领袖地位。

中国共产党鉴于国际及中国之经济的政治的状况，鉴于中国社会的阶级(工人、农民、工商业家)之苦痛及要求，都急需一个国民革命。拥护工人农民的自身利益是我们不能一刻忽忘的；对于工人农民之宣传与组织是我们特殊的责任；引导工人农民参加国民革命更是我们的中心工作。我们的使命是以国民革命来解放被压迫的中国民族，更进而谋世界革命，解放全世界的被压迫的民族和被压迫的阶级。

中国国民革命万岁！

全世界被压迫的民族解放万岁！

全世界被压迫的阶级解放万岁！

揭秘：苏联帮中共与国民党争夺东北的各种手段

核心提示：蒋介石借机拒绝苏军经济合作要求，并威胁将东北问题闹上联合国。至此，苏联只能撤军了。1946年3月，他们以最快的速度从抚顺、吉林等地撤军，却不通知国民党方面，使后者无法派人接管，而苏联通知中共方面可“自由行事”。

在二战结束前的雅尔塔会议上，美苏就战后如何瓜分势力范围大致达成了妥协。然而，中国的东北成了一个“灰色地带”，苏联在这里拿到了大量权益，但美国并没有明确宣布这里是苏联的势力范围，其主权也仍属于蒋介石政府。于是，东北成为各方争夺的目标。

苏军耍了杜聿明

根据1945年8月14日签署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苏联应在日本投降的3个月后从东北撤军。于是，蒋介石开始了接管东北的准备工作。

他派杜聿明率领部队准备从大连登陆。不料，苏联人以“大连为自由港”为由，拒绝国民党军队在此登陆。杜聿明随即赶到长春，与驻东北苏军最高指挥官马林诺夫斯基交涉。马林诺夫斯基表示，国民党军队可以从营口、葫芦岛登陆。国民党第13军在美国舰艇的搭载下，来到营口。

不料，第13军的登陆动作遭到强力阻击。杜聿明在美国军舰上用望远镜向岸上观察，赫然发现陆地上有八路军在修筑工事。由于美国军舰不愿意卷入冲突，此次登陆行动只能作罢。

默许中共在东北发展

原来，中共高层早就判断苏联对日作战是



苏联帮中共

问题国际化,给苏联施加压力。

苏联暂时屈服,强迫中共部队从长春等地撤出。之后,苏联与蒋介石的矛盾逐渐激化:苏联提出,中苏应当签署新的经济合作协议,其内容是中国若要在东北进行经济开发,必须与苏联合作,不允许第三方介入。对

迟早的事情。此外,毛泽东判断,对日作战结束后,美苏矛盾会逐渐尖锐,苏联对中共也会有一定程度的支持。这使中共控制苏军占领下的东北成为可能。

早在1945年4月,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就提出今后要在东北发展根据地。1945年8月11日,日本还未宣布投降,朱德就下令最接近东北的冀热辽军区立刻进军东北。而苏联红军高层对此也采取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

蒋介石煽动反苏浪潮

蒋介石起先并未意识到东北的重要性,但杜聿明的登陆失败使他很快意识到,如果把东北扔给共产党,将使后者获得一个牢固的战略基地,后患无穷。于是,他决定不惜代价与中共争夺东北。

为此,国民党军先后攻陷了山海关和锦州,蒋介石又照会了苏联大使馆,并致电杜鲁门,介绍东北局势等情况。这等于是将东北

此,美国坚持其“利益均沾”原则不容撼动,以美国为幕后大老板的蒋介石自然无法答应。为此,苏联一再拖延撤军时间,为中共进占东北提供便利。

1946年1月16日,国民党东北行营工矿处副处长张莘夫在前往抚顺接收矿业时被杀。蒋介石乘机在国内煽动反苏浪潮,蒋认定他是死于苏联人之手。

蒋介石借机拒绝苏军经济合作要求,并威胁将东北问题闹上联合国。至此,苏联只能撤军了。1946年3月,他们以最快的速度从抚顺、吉林等地撤军,却不通知国民党方面,使后者无法派人接管,而苏联通知中共方面可“自由行事”。中共部队迅速占领了佳木斯、牡丹江等沈阳以北重镇。

至此,苏军结束了对东北长达8个月的占领。就在苏军撤走后不到一个月,东北解放战争就拉开了帷幕。



毛泽东、周恩来的最后一次旅行

共和国领袖毛泽东、周恩来都曾多次乘坐空军专机，并留下了不少令人难忘的轶事趣闻，但他们的最后一次航行至今鲜有记述。笔者长年在空军工作，对毛泽东、周恩来的最后一次航行的专机组成员进行了采访。现根据采访记录整理成文，以飨读者。

清晨，毛泽东专机紧急从武汉起飞

1967年7月，由于江青等人的煽风点火，武汉的两派群众组织“百万雄师”和“工总”之间的派别斗争愈演愈烈。20日，局势已难以控制，武汉三镇涌动着全副武装的军民，各种口号声和枪声不绝于耳。

周恩来得知武汉告急的消息后，担心少数坏人有可能利用狂热的群众冲击毛泽东的住地，危及毛泽东的安全。因此，他力劝毛泽东暂时离开武汉。在周恩来及其他人的反复劝说下，毛泽东才同意前往上海，并同意破例坐飞机（1959

年后，为确保毛泽东的安全，中央决定，毛泽东出行不再坐飞机）。

具体负责毛泽东安全的杨成武紧急安排毛泽东的专机，经商量，最后确定使用潘景寅驾驶的232号飞机，因为这架飞机有包间，包间里有床，便于毛泽东休息。

1967年7月21日清晨，载着毛泽东的232号专机起

飞了。飞机离开地面不久，毛泽东独自走进驾驶舱，与机组打过招呼后便急切地询问机长：“到上海需要多长时间呀？”

“一个多小时。”机长王进忠回答。

“现在飞多大速度？”

“每小时700多公里。”

毛泽东点了点头后，没再问什么，也没有看一眼机外的景色，便回到他的包间。显然，毛泽东是急于了解到达上海的时间。

王进忠很关心毛泽东的休息，飞机平飞一段时间后，他便轻轻走进客舱，从门缝中看到毛泽东与历次坐飞机不一样。之前每次乘机时，毛泽东从不休息，有时找人谈工作，有时学英语，更多的时间则看书。而眼前的毛泽东却是半躺在床上，脸冲着机舱舱壁发愣。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飞行，专机安全飞抵上海虹桥机场。毛泽东受到前一天

专程从北京赶来的张春桥的迎接。从武汉来到上海,毛泽东的心情好了很多,眉头舒展了。下飞机后,他高兴地对接机人员说:“你们为什么不让我坐飞机?还是坐飞机好。”1967年7月21日,这是毛泽东的最后一次航行。

雨夜,周恩来带病从长沙回京

1974年12月22日深夜,北京航空兵某师师长杨扶真接到叶剑英元帅的电话:“明天中午1点,周总理要坐三叉戟飞机去长沙。你挑选一架发动机好的飞机。”

杨师长根据叶帅的指示,决定由自己亲自带队。在下达飞行任务时,机组成员一听是执行周总理的任务,都抑制不住内心的欣喜。周总理又能坐飞机了,说明总理的病好了。

翌日下午1点多钟,周恩来的专车径直开到了飞机旁边。以往,周总理都是在候机室大楼门口下车,而后在候机室与送别人员作短暂的话别后再登机。这次周总理走出汽车后,没有与任何人交谈便向登机梯走去。坐在驾驶舱里的汪云等人发现,总理步履艰难,需要人搀扶。脸上也失去了往日的光彩,不仅十分憔悴,而且长满了黑色的斑点。在总理的身后还跟着一群医务人员,带着各种急救器材。

248号专机起飞后,空姐马艳萍见总理重病缠身,以为他会躺在床上休息,便给总理整理好了床铺。谁知疾病虽然使总理的身体消瘦,但他仍忍着剧痛强打精神,和往常一样坐在沙发椅上与随行人员交谈。他将杨

师长叫到身边,了解部队的情况。他说:“一年多没坐你们的飞机了,在医院里住了8个多月。”

杨师长马上接道:“现在医疗技术很先进,总理的病一定能很快治好。”周总理对杨师长的良好祝愿没有说什么,只是微微一笑。临行前,医务人员再次发现周总理便中潜血,需要马上进行检查治疗。为此,医疗组的同志极力反对周总理的长沙之行,可是如果他不亲自飞往长沙见毛泽东,向他汇报四届人大的准备情况,特别是人事安排,就很难挫败“四人帮”的“组阁”阴谋,国家政权就有落入“四人帮”之手的危险。

当天下午3点多,周总理乘坐的248号专机,在长沙安全降落。

4天之后,也就是12月27日晚,周总理结束了长沙之行,乘飞机返回北京。

经过长时间飞行,周总理的专机顺利地降落在北京西郊机场。机组人员本以为身患重病的周总理,在时间已经很晚的情况下,一定是径直下飞机离去。但周总理却用手扶着机舱的墙壁,艰难地向驾驶舱一步步地挪去。

他和往常一样,离机前要到前舱亲自看望机组的全体同志,向他们表示感谢。当总理走进驾驶舱时,脸上有了汗珠,呼吸也有些急促。他站在通道里,稍微缓了口气后对机组说:“你们飞得很好,很平稳,我以后还要坐你们驾驶的飞机,谢谢你们。”

周总理和机组握别后,结束了他的最后一次航行。



毛泽东曾“警告”彭德怀别造反

1956年11月,彭德怀到某部视察,看到墙上《军人誓词》第1条是“我们要在毛主席领导下……”,他说:“这个写法有毛病,现在的军队是国家的,不能只说在哪一个人领导之下。我们是唯物主义者,毛主席死了谁领导?今后要修改。”

1959年的庐山会议,毛泽东错误地发起了对彭德怀的批判,造成了一个历史悲剧。彭德怀平反后,所有关于彭的传记,都把彭塑造为一个刚直不阿的形象,似乎历史已成定论。毛泽东和彭德怀作为井冈山时期的老战友,为何最终分手,其中的原因却少有论述。1998年,原彭总身边的工作人员、军事科学院前院长郑文翰中将以及王焰、王亚志、王承光同志终于打破沉默,出版了《秘书日记里的彭老总》一书,使我们了解到当年党内斗争的错综复杂,也使读者了解了庐山会议前后毛彭斗

争的历史真相。

上海会议上,冲突公开化

在长达几十年的革命战争中,彭德怀一直是毛泽东最为倚重的战将。新中国成立之初,彭德怀临危受命,指挥抗美援朝作战,打败了现代化的联合国军,立下了赫赫战功。回国之后,他又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建设做出了卓越贡献。但此时,他与毛泽东的关系却出现了微妙的变化。俗话说“功高震主”,毛泽东最重视军队,但彭德怀在一些重大决策上,对毛请示不够或不及时,使毛感到彭权重位高,越来越难以驾驭。毛后来批彭“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指的就是这一时期。1958年5月6日,毛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讲话,提出“要准备对付党的分裂”,就是针对彭说的。25日,中共中央八届五中全会上,毛泽东提议养病几年的林彪出任

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位居彭之上。彭处于一个尴尬地位,他向中央提出不再担任国防部长的请求。6月9日,中央政治局在中南海召开常委会,当年1月在南宁会议上因“反冒进”受到毛严厉批评的周恩来提出辞去总理职务,彭提出辞去国防部长职务。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后,决定“他们应当继续担任现在的工作,没有必要加以改变”。情况不同的是,周是被动提出的,彭是主动提出的。这使毛感到彭是在以辞职对他表示不满。1959年3月上海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当彭再次向毛提出不再担任下一届国防部长时,毛严厉地说:“副总理兼国防部长还不够吗?”彭“噤然无语”。

此后,毛与彭的关系骤然紧张,冲突也公开化。就在上海会议上,毛在批评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工作时,突然话题一转,对在场的彭说:“彭德怀同志,你是恨死我了,因为我批评过你。批评你是为你好,我没有偏心。”还说:“你彭德怀是一贯反对我的。我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我年纪大了,要办后事,也是为了挽救你。”

这种警告在党内高级干部中,是极为少见的。说明毛对彭的成见已经非常严重,彭应该感觉到政治上的危险。但彭却是莫名其妙,还问别人主席为什么敲打他。知情人其实看得很清楚。当时任总参谋长的黄克诚大将回忆:“早有一次,主席对彭开玩笑似的说:‘老总,咱们定个协议,我死以后,你别造反,行不行?’可见主席对彭顾忌之深。而彭并未因此稍增警惕,依然我行我素,想说就说。”事实也

是如此。

彭在几次公众场合,说了针对毛的话。秘书们记载:1956年11月,彭到某部视察,看到墙上《军人誓词》第1条是“我们要在毛主席领导下……”,他说:“这个写法有毛病,现在的军队是国家的,不能只说在哪一个人领导之下。我们是唯物主义者,毛主席死了谁领导?今后要修改。”1959年1月30日他在后勤学院学员毕业大会上讲话说:“躯壳都是要死的,人家说万岁,那是捧的,是个假话。没有哪个人真正活一万岁。”这些话都是大实话,但在那个个人崇拜的年代,这些话都是很“犯忌”的。

这些矛盾和成见,两人一直没有机会当面交心,来缓解和消除。到了1959年的庐山会议,终于发展为政治斗争。当然,大前提是毛错批了彭。但从秘书的记载看,这个事件绝非偶然,更不是毛的一时冲动,其中有多种因素的促成。





20 世纪 50 年代 中国严打日本“入侵”渔船

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美军进驻日本，日本作为战败国，主权为美国所操纵。这期间，美国借口解决日本粮食短缺问题，怂恿日本渔船出海捕鱼，先后四次组织非法入侵中国东海、黄海，肆意扩展日本渔区，并划定“麦克阿瑟线”，严重侵犯中国海洋权益。但当时中国正处于内战时期，无暇分力对外，只能听之任之。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美国重新调整了对东亚的战略部署，在海上对新生的中国政权采取“半月形包围圈”策略，日本再次充当其中的一颗棋子。日本当政者受美国指使，坚持与中国为敌的政策，做法之一就是有计划、有组织地派遣大批渔轮入侵中国沿海捕

捞，侵犯中国领海主权，掠夺渔业资源，挤压中国渔船作业区，破坏渔业生产。同时，趁机为美军和台湾方面搜集中国沿海气象、水文及军事情报，充当帮凶角色。

日轮侵渔的主要海区为吕泗、长江口、舟山、渔山等渔场。特点是，行动时间随着沿海渔汛而变化，尤以每年 11 月至翌年 5 月的冬、春渔汛期为猖狂。形式为，聚集几十条至数百条渔轮，突然闯入中心渔场，损坏渔民网具，使用武器袭击渔船，甚至射击我护渔舰艇。强行靠帮渔船进行特务活动，散播反动宣传画、美人画。

面对日方的挑衅，虽然广大渔民迫切要求予以打击制止，但是鉴于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领海线尚未正式公布，海上防卫力量薄

弱,防卫局面一直疲软乏力。自 1952 年 7 月 1 日起,日本海上保卫厅竟然派遣监护船至东海、黄海一线巡弋、掩护日本渔轮活动,进一步将非法侵渔扩大化。这时,华东海军接到上级指示,为了保护领海主权利益,保障中国渔船在历年习惯的渔区作业,沿海舰艇部队在负责巡逻剿匪、解放岛屿作战的同时,对于进犯之日本渔轮予以坚决打击。

各海上观察站接到命令后迅速行动,纷纷上报日轮活动的情况。时任舟山基地司令部作战参谋的孙树楨回忆说:“我值班时候一天接到 200 多份情报,标图都来不及。所有的情报都附加着一个要求赶紧派军舰过来。”

二

华东海军有关档案资料记载了当年部分反侵渔情况——

1950 年 12 月 29 日,嵊泗巡防团武装渔轮 8 艘,在海礁附近领海内拘捕侵渔日轮 4 艘,船员 42 人。经过华东军政委员会批准,没收渔轮 3 艘及渔获物 2400 箱,人员及船 1 艘经水产部门审查教育后释放。

1951 年 2 月 17 日,嵊泗巡防部队在嵊山东南领海内拘捕日本不法渔轮 4 艘,该批船只无航海日志,藏有一张军事部署图,行迹可疑。经报请华东军政委员会批准,没收渔轮 3 艘,其中 1 艘及人员经公安部门审查后释放。

1951 年 9 月 21 日,鉴于日本渔轮时常侵入大沙渔场,破坏中国渔业生产,并为美方刺探收集情报,华东海军决定组织水雷大队、吴淞水警区、连云港巡防大队的舰艇,配合苏北

军区、华东公安部及水产公司的武装机帆船、渔轮,结合海上剿匪,对苏北海区进行了一次搜捕侵渔日轮的行动。

1952 年 2 月上旬,大批日本渔轮在日本海上保安厅监护船掩护下入侵嵊泗渔场,猖狂破坏。华东海军“南昌”舰及嵊泗巡逻艇大队奉命出击,配合华东公安部、水产公司舰船展开围捕。9 日、10 日共捕获日本渔轮 7 艘。

时任大队航海员的孙梅生在他晚年的回忆录《寒梅录》中记录了这次海上行动:

几十艘日本入侵的渔轮,每艘上面都有 8 至 10 个日本渔民,他们在前面跑,我们在后面追,用 76.2 毫米口径炮拦截,然后靠上去检查。

我们搜捕时,发现船舱里还冰藏了刚捕捞的鲜鱼,每船住舱内都有一尊菩萨像,每日敬拜,非常诚心,祈祷菩萨保佑海上平安。少数船上还有日本共产党出版的书籍、报刊和其领袖德田求一的照片,猜测渔民中也有日本共产党组织。

事后,上级要求我们派出 7 名干部押送该船到上海。我和李航海长负责操纵指挥,陈景文负责通信联络。舵面和机舱人员仍使用日本人,操舵的也是日本人,他们共 8 人,年龄 40 岁左右,和我们伙食分开,主要是害怕中毒不测。半夜航行过泗礁列岛后,本应向西北方向航行,操舵的日本人很坏,悄悄改航向? 035 度,想逃回本土,幸亏被我及时发现,我用手枪敲他的背,叫他航向 315 度,他只好改正过来。这些日本渔民不少在侵华日军中服役

●史料钩沉●

过,到过中国,会说中国话,我们写中国字他们也认识,我们就用这种方法和他们交流。经过 20 小时的航行,我们进了吴淞口,后停泊在苏州河口扬子江码头,把船和人一并交给上海外事局。

1952 年 7 月 12 日,日本渔轮 4 艘潜入中国东海长涂与衢山之间,深入中国领海达 28 海里,抵近海军基地和设防岛屿进行侦察活动,后全数被我拘捕。

1952 年 12 月 13 日,华东海军淞沪基地巡逻艇 2 艘在启东海面执行检查侵渔日轮任务,与日本监护船 1 艘遭遇,日船突然率先射击,打死巡逻艇员 1 人,伤 13 人。

1953 年 3 月华东海军接渔民报告,大批日本渔轮连日侵入南韭山附近渔场进行破坏。3 月 22 日,第六舰队“南昌”、“广州”、“沈阳”3 舰在副司令冯尚贤率领下,协同舟山基地护卫舰“瑞金”、“淮阴”、护卫艇 5 艘,采取夜间行动,拂晓推进,速战速决的战术手段,捕歼、拘押侵渔日轮 8 艘。“淮阴”舰在追捕中被日轮撞伤。据日本船员供称,日本渔轮侵渔时有监护船巡逻保障,各船船长、报务员,负有为美、日侦察收集中国沿海潮汐、气象、岛屿地形等任务。从日轮航海日志中查获,该批船只曾先后多次入侵中国领海,甚至窜入长江口及花鸟山一带海区。经总参谋部批准,将该批船只没收,“楚材晋用”。

此后,1954 年 1 月 28 日、3 月 18 日、4 月 29 日,又拘捕侵渔日轮 8 艘。后据华东军政委员会转告,报请周恩来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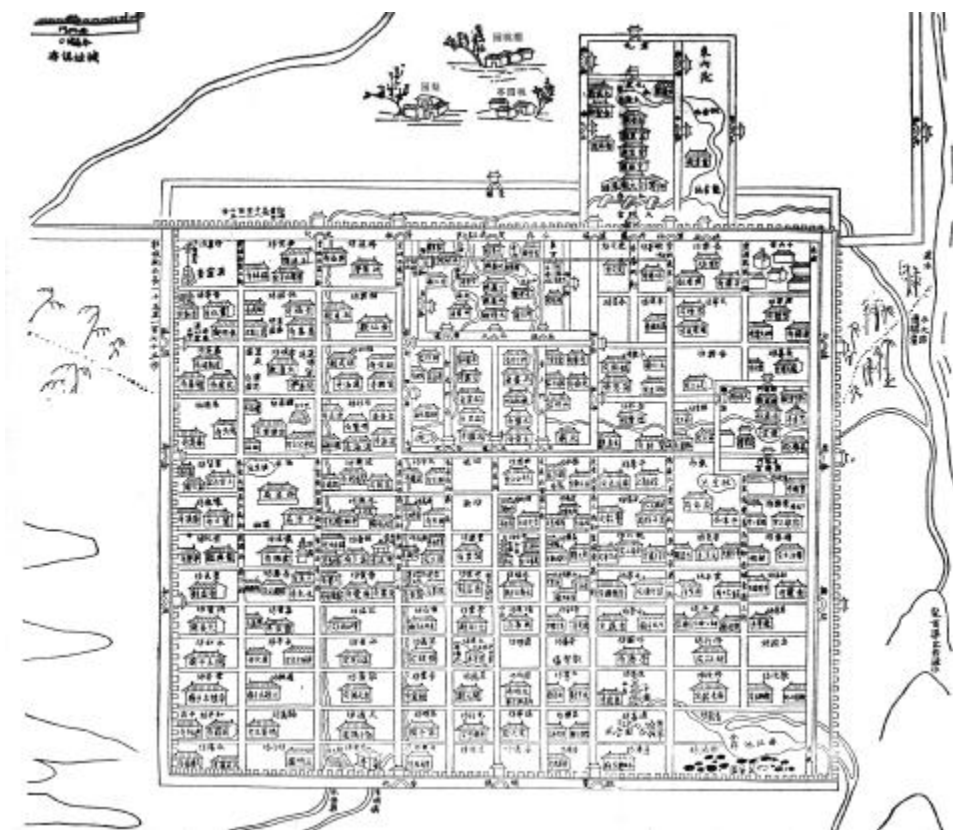
理批准,于当年 11 月 1 日全部释放。

有关资料记录,自 1950 年 12 月至 1954 年 4 月,华东海军共拘捕从事侵渔和不法活动的日本渔轮 32 艘,船员 384 名。根据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政务院的规定,对拘捕船只,经华东军政委员会、中央军委批准,没收改装军用 21 艘,释放 9 艘。船员全部交地方政府审查后遣返。

三

朝鲜战争停战后,鉴于国际形势变化和日本侵渔活动有所减少,同时照顾日本广大渔民的实际困难,争取日本人民,促进两国关系发展,中国方面停止了捕捉没收船只的捍卫办法,中国渔业协会和日本渔业协会在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下,就东海、黄海的渔业问题举行谈判,于 1954 年 4 月 15 日签订了关于东海、黄海渔业关系协定,基本上将日本渔轮限制在禁止捕鱼线外,对日本侵渔斗争渐渐趋于缓和。





隋唐长安城门趣闻(十二)——光化门

(隋唐长安外郭城北面偏西门,实为禁苑南门之一。遗址在今西安城西北郊火烧碑村)

1.光化门北对梨园

入光化门正北,为禁苑中梨园。南宋程大昌《雍录·梨园》载:梨园在光化门北。光化门者禁苑南面西头第一门,在芳林、景曜门之西也。梨园旧址约在今西安西北郊白家口村。

梨园为禁苑中风景园林之一,以广植梨树而得名。园中有梨园亭、毬场,是唐代皇帝与臣僚入苑游赏和举行拔河、击毬娱乐活动之处。开元二年(714年),唐玄宗在此梨园置院,成立皇家艺术学校,传习“法曲”,专门教习音乐舞蹈。男女艺人三百余人,得玄宗亲为点授,号为“皇帝梨园弟子”。

2.光化门西汉灵台

在光化门西的修真坊,有汉灵台余址。汉灵台,为汉代天文气象观察台。汉武帝太初四年(前101年)立。初名清台,武帝时造太初历之所,后更名灵台。据《三辅黄图·汉灵台》载,灵台“本为候者观阴阳天文之变”处,台高十五仞(古代八尺为一仞),上有张衡所制浑仪,并有相风铜鸟,遇风乃动。又有铜表,高八尺,长一丈三尺,广尺二寸,上题云太初四年造。光化门西修真坊有汉灵台余址,时“崇五尺,周一百二十步”(《长安志·修真坊》)。遗址约在今西安西郊任家口村以东。

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

成立于1993年9月,2000年2月被国务院批准为国家级开发区。位于西安市北门外、城市南北中轴线——未央路两侧,北二环和绕城高速公路之间,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距西安市老城中心5.5公里,距西安铁路客、货运站5公里,距西安国际航空港仅15分钟车程。全国规模最大的铁路换乘站(西成、大西、徐兰、西银等四条快速铁路交汇的枢纽型车站)——西安火车北客站处于区内,已于2011年1月11日开通运营。四通八达的区位优势,使开发区与郑州、太原、兰州、成都、银川、石家庄等中西部中心城市形成一日经济圈。由中央商务区、出口加工区、草滩生态产业园等功能园区组成,规划总面积71平方公里。

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贯彻“以建立三资

企业、工业企业和出口创汇企业为主,致力于“高新技术产业化”的“三为主一致力”方针,已成为西安市的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投资热点。作为国务院批准的西部地区国家级开发区,享受国家级优惠政策,而且也享西部大开发的各项优惠政策,经国务院批准,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即将设立西北地区唯一的国家级出口加工区。

中期目标,到2015年,全区技工贸总收入超过4200亿元,工业总产值超过2500亿元,外贸进出口总额超过30亿美元,地方财政收入超过25亿元;新增300家投资过亿元的企业,世界500强投资企业达50家,新增固定资产投资达到1255亿元,逐步跃升成为中西部经济强区。





户县曲子

◎ (乌云高娃整理)

户县曲子,也叫“眉户”,俗称“迷胡”、“曲子戏”,文人学士称之为“清曲”。盛行于西安和关中地区,陕南、陕北也广为流行,是西安地区的主要戏曲剧种之一。

“曲子戏”源于隋唐时期的清曲和宋代的曲子,已有 1400 余年历史。形成的确切时间很难考证,大约在明、清时期。清嘉庆、道光年间(1796—1850),已经出现正式演出班社,大多与秦腔同台演出,民间称为“风搅雪”。其形成主要经过家儿戏和舞台戏两个发展阶段。家儿戏为“自乐会”、“念曲子”、“地摊子”和“板凳曲子”的坐班清唱形式。分为二类:一是清客曲子,系文人雅士茶余酒后娱乐消遣所唱,词曲比较典雅;一是江湖曲子,是民间的一种娱乐和艺人们坐摊卖唱的形式,多反映的是通俗的民间生活内容。同时还吸收了秦腔戏的许多艺术表现手法和演出剧目。随着历史的发展,迷胡戏除沿袭“清曲”和“曲子”时期的围桌坐唱、地摊演出“板凳曲子”的表

演形式外,逐渐发展为以舞台演出为主要的表演形式。开始演出的剧目以两小、三小戏为主,剧目的角色行当、故事情节、表现艺术手法都比较简单。与秦腔等大型剧种同台演出以后,移植了许多大型剧目,使其发展成为一个行当齐全,剧目丰富,表现手法多样的大型剧种。迷胡演出的传统剧目十分丰富,20 世纪 60 年代挖掘整理收存的传统剧目就有 520 余本。其唱腔音乐属于曲牌体系的音乐体系,由长短不等的词句构成曲牌联套的音乐结构形式,共有 72 大调,36 小调。大调的结构比较完整,有较强的戏剧性,小调的结构多近于民歌小调之类。迷胡所用乐器有文场和武场之别。文场原以三弦为主,板胡、海笛辅之,随着迷胡戏的发展演变,后加入了杨琴、二胡、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和一部分中西管乐;武场打击乐基本与秦腔等大型剧种相同,有鼓板,牙子、大小锣、铙钹、铰子、梆子、碰铃等。

【导读】 2013年3月22日至3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出访俄罗斯等国，夫人彭丽媛也在国际舞台上展开了“中国第一夫人”的魅力攻势。但新中国成立时，“夫人外交”几乎是空白。究竟是谁打破了新中国“夫人外交”的沉闷格局？



新中国“夫人外交”由何而来？



陈毅元帅和夫人张茜

一个新的使命悄悄地走向张茜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总理一直兼任外交部长，总理工作是最繁忙的。而随着新中国的发展，国际地位也越来越高，外事接待任务越来越重，中央开始为周恩来物色一个外事助手。陈毅的留法资历，在抗日时出色的统战成绩，管理上海的游刃有余，使他成为中央的最终人选。1954年9月28日，在全国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上陈毅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不久邓小平代表中央和陈毅谈话，陈毅正式调中央工作并逐渐转向外交工作。10月3日，陈毅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参加访问民主德国和波兰，开始了他的第一次独立外交活动。随后就频繁地出现在各种外事活动中，几乎每天都要会见来访的外国朋友。1955年4月，陈毅随同周恩

来参加亚非会议(万隆会议),等于公开了陈毅是周恩来外交助手的身份。1958年1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任命陈毅为副总理兼外交部长。

随着新中国的国际影响越来越大,外交活动也越来越多,特别是东南亚的国家成为了当时中国外交活动的重点之一。东南亚一些国家领导人访华都带夫人一起来,而中国却没有一个固定的夫人参加接待,常常是临时拉人,接待工作效果自然要差些。陈毅后来讲过:“新中国成立后在全世界最吸引人,世界上许多人都想来中国看看。外国领导带夫人来了,如果我们只招待男国宾,无人招待他们的夫人,就不合规格,人家会认为一个革命的国家,却对妇女不重视。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即将带夫人来访,我们领导同志的夫人去陪陪,是合乎人性的,而且还可借机做友好工作。”

为了打开夫人外交沉闷的局面,陈毅首先动员自己的妻子张茜,安排她和自己一起参加驻华使馆的宴会,一起接待来华的外国团体。1956年,张茜被安排参加由李德全率领的中国妇女代表团访问巴基斯坦。代表团成员都是妇女界有名的人物:龚普生、刘清扬、韩幽桐、张茜、拉希达、黄甘英、钱行。其中刘清扬是团员中声名最显赫、年纪最大的老大姐。她是中国共产党成立时的56位党员之一,参加过同盟会,还是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张茜是年纪最轻的。

临行前,全国妇女联合会副主席邓颖超在参加代表团的准备会上专门提到:这次到

巴基斯坦访问接待方可能会对张茜的接待规格高些,这是因为陈毅同志是国务院副总理,在外交活动中十分活跃。巴方如有这样安排,也是做给我们政府看的,希望团里的其他同志要支持团里的工作,也要支持张茜同志的工作。邓颖超的这番话已经明显表露出对张茜今后工作的设想。1957年又增补张茜为全国妇联执行委员。

邓颖超劝张茜挑夫人工作的头

为了更好地开展外交活动,陈毅动员张茜出来,专门做外交工作和夫人工作,张茜不愿意,她已经有了自己的新目标,还在想一年内翻译两本书,几年内有十几本的成果。她希望有自己独立的事业,因为文学艺术一直是她的最大喜好,喜欢读书,喜欢戏剧,喜欢写作。陈毅几次动员,张茜就是不答应,临时客串可以,专职不干。陈毅没办法,就向周恩来和邓颖超告急。周恩来就对邓颖超说:“你去做做工作,女同志之间总好说话。”

邓颖超把张茜约到西花厅,劝她出面挑夫人工作的头,她说这是项外交工作,也是一项妇女工作,你的条件非常好,非常适合这项工作,一定能干好这项工作。最后强调说这是一项政治任务,周恩来同志希望你能担任这项工作。事已至此,张茜也只好服从了。她回到家里,把铺在桌上和放在枕头边的心爱的几种中俄大词典和她几年积累下来的上百的单词本都集中起来,堆进了书架的角落里。

张茜作为中国外长夫人的第一次外事活动,是代表陈毅出席各国驻华使节和经济代

●文史拾趣●

代表团举行的宴会。这次宴会本来是陈毅作为新一任外长与驻华的外国官员的首次正式见面,可是在宴会前陈毅突然病倒,临时决定由张茜代表陈毅出席会议并致辞。这一行动在中国是罕见的,各国大使和团长也大吃一惊,感受到了中国外交的一种崭新的灵活性,同时也认识了美丽而大方的外长夫人。这是张茜以夫人身份出现于外交界的处女作,留下了一段佳话。

率妇女代表团访问柬埔寨

1958年7月,中国与柬埔寨王国建交。8月,当时报柬埔寨首相西哈努克亲王第一次访华。新中国的建设成就给西哈努克亲王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坚定了柬埔寨王国与中国友好的决心,明确了走独立、中立的路线。期间,西哈努克多次邀请周恩来总理夫人和陈毅外长夫人在柬送水节(11月25日至27日)时到柬访问,他将亲自主持接待。西哈努克的盛情和诚意使人无法推辞,陈毅答应由其夫人张茜率一个妇女代表团前去访问。

国务院外事办很重视这项访问,和外交部、全国妇联多次协商,组成了11个人的代表团,团员9人,翻译2人,于1958年11月23日至12月1日到柬埔寨友好访问。除了团长是张茜,另外8个团员均是各行各业中的女子佼佼者,每一个人都可以写成一本书。

这样一个由中国妇女精英组成的代表团,在柬埔寨获得了极大的尊重和高规格的接待。柬埔寨国会的唯一女议员方秉祯夫人

出任接待委员会主席,而实际上全部接待工作都是由西哈努克亲王亲自组织,柬埔寨哥莎麦王后宴请代表团,金边各大报纸专门发表专版和大幅报道。

8天里,代表团访问了金边市和磅湛等4个省,参观了学校、工厂、医院、农社、橡胶园等50个单位,访问了柬埔寨红十字会、妇女协会等团体,游览了吴哥窟等古迹名胜。在各种场合发表了正式讲话十次,不但会见了王室的各成员与政府首相,大臣的夫人、各省省长夫人、部长夫人等社会妇女代表更是热情相见。

张茜作为团长,她的美丽、她的大气受到了柬埔寨各界的赞扬。张茜在各场合的讲话始终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对柬埔寨王国奉行民族独立、和平中立政策的支持,感谢柬对中国政治上的支持,希望进一步加强中柬妇女的交往和进一步巩固中柬友谊。张茜还多次向柬王室传达中国国家领导人对柬王室和各成员的敬意,代表全体团员对西哈努克亲王的才能与对社会的贡献表示赞扬。

这次访问是中国与柬埔寨王国建交后第一个政府派的正式访柬代表团,而且是由清一色女性组成的代表团,不但向柬王国展示了新中国的热忱和昂扬,而且又展示了中国东方女性的从容美丽,完全打破了当时国际上对中国革命的种种误解,受到各界人士的纷纷赞扬。而居柬华侨则更多地受到鼓舞,他们十分兴奋,代表团所到之处,华侨几乎全体出动,夹道欢呼,表达了对祖国亲人的欢迎和

对祖国的思念。

“陈毅元帅夫人张茜万岁”

1966年,正值“文化大革命”初起之时,又一项出国访问任务落在了张茜的头上。事情要从1966年柬埔寨的国内形势说起,当年柬右派朗诺组阁,其路线右转。而之前李先念副总理访问柬埔寨刚刚与西哈努克国王商定,支持越南南方的反美斗争。因此西哈努感到压力很大,急需中国的支持,来对抗国内亲美势力的巨大压力,于是9月1日就正式致电中国外交部,邀请中柬友好代表团访问柬埔寨。鉴于国际斗争和外交战略的需要,国务院外办同意派中柬友好代表团出访柬埔寨。先准备王昆仑为团长,可是王昆仑当时正在受批判,是政治上很敏感的人物。几经酝酿,最后决定还是由张茜率团访问柬埔寨。这次访问充满了“文革”的痕迹:组团时,特别选了一位农民劳动模范陈永康和一位工业劳动模范瞿兰香;在排位置时,专门把两位劳模排在前面,让他们坐宴会的主桌,与柬埔寨的王公大臣同桌。

张茜开始穿的也是长裤中式套装,和团员们一样胸前别着一枚毛主席像章,后来因柬埔寨的天气实在太热,才换上了短袖和裙子。在饭店吃早餐时,忽然有个别人举着毛主席语录喊“毛主席万岁”。大使夫人康岱莎因为一直没有回国,不知道国内的情况,很是惊讶,说搞什么名堂;看张茜和其他团员却低头吃饭,不吭一声,更是觉得奇怪。吃了饭张茜和陈叔亮、康岱莎大使夫妇在花园散步,就悄悄讲了国内“文革”的一些情况,让他们大吃

一惊,但还是想像不出国内的情况。

西哈努克非常隆重地接待了张茜率领的中柬友好代表团,三次接见,三次宴请。而5月副总理李先念率政府代表团访柬时,西哈努克只参加了一次会见和宴请。张茜代表总理周恩来和副总理陈毅表示坚决支持西哈努克的中立政策。西哈努克和张茜谈得很融洽,以致在代表团去外省访问时,道路两边的欢迎人群中,居然打出了一幅“陈毅元帅夫人张茜万岁”的标语。张茜看了大吃一惊,心想这下子回国可不好交代,只好不动声色地继续向前走。代表团团员也都看见了,知道事关重大,都像没看见一样。所幸回国后没有一个人提到这个标语,张茜和代表团也就逃过一劫。事过30年后,当时的翻译吴建民和大使夫人康岱莎才笑谈了这事。

张茜对柬埔寨的访问,稳定了西哈努克的情绪,使中柬两国友好的关系延长了大半年。然而在“文化大革命”极左高潮的影响下,中柬两国友好的关系在1967年又遇到一次重大危机,不过这已经与张茜无关了。

新中国成立以来,张茜共出国访问21次,到过苏联、瑞士、印度尼西亚、越南、柬埔寨、缅甸、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锡兰(斯里兰卡)和阿富汗,算上后来成立的孟加拉国共12个国家。在国内,张茜接待过许多的总统夫人、王后、公主、首相夫人、总理夫人、部长夫人和妇女界人士,在中国的外交事业特别是在东南亚的友好往来中留下了自己的名字。



毛泽东时代的大吃大喝现象

“舌尖上的浪费”，是时下的流行词语，人们很容易由此联想到“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成语，一些人或许会认为中国以前并没有浪费现象，特别是在毛泽东时代，以至于认为解决大吃大喝现象需重回毛泽东时代，但事实真的如此吗？毛泽东曾经在中共七届二次会议上说：“有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衣炮弹面前要打败仗。”

毛泽东此论其实并非无的放矢，因为中共干部进城时，大吃大喝的现象便开始显现。比如，南京地下党干部就反映南下干部与军队干部中出现不少官兵还不按规定购买车票，恃强乘车、购物以及不购门票，强行进入

娱乐场所；少数晚来的干部认为自己没有捞到好处，就伸手要求住好房子、坐好汽车，骄横蜕化、铺张浪费。进城后生活就开始腐化，带头抢房子，争汽车，抢物资，要秘书，做官当老爷，追求享受，大吃大喝。

建国初期，大吃大喝铺张浪费的现象并非是个例，毛泽东本人便亲自领教了这种事情。1950年2月7日，毛泽东从苏联回来，到了哈尔滨。哈尔滨市委设宴招待，把最好的东西做给他吃，有熊掌、飞龙等。第一顿饭，有胡志明在座，毛泽东吃了。回到住地，毛泽东对卫士李家骥说，这么好的饭有没有必要啊？没有必要嘛！我们的国家这么穷，搞得这么丰富干什么！你去交代一下，从明天开始，还按我们在家的标准去办。后来到了沈阳，饭菜比哈尔滨安排得还好。毛泽东很生气，接见干部时

专门讲了这件事。

“铺张浪费”的现象在国宴中表现十分明显,毛泽东对此有过相关批评,他说:“接待宴会,大讲排场,吃掉的还没有扔掉的多,白白浪费了国家的金钱和物资。他认为宴会规格太高,千篇一律都上燕窝鱼翅那些名贵的菜,花钱很多,又不实惠。有些外国人根本不吃这些东西。”建国初期,面临着复杂的社会形势,如果说“铺张浪费”是因为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进攻,还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但即使有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和中共“三反”、“五反”运动的打击,也未能从根本上遏制大吃大喝的浪费现象。

20世纪50年代后中国经历了“三反”、“五反”运动,“吃喝风”受到以毛泽东为代表中共高层的严厉批评,但在具体的执行层面却效果不佳。1953年胡志明曾与新华社记者戴煌闲聊时婉转表达了对中国同志在招待宴请中的铺张浪费:“这几年,几乎凡是去过你们国家的越南同志回国后都说,你们招待外宾的酒菜极为丰盛,都是些海参、鱼翅、对虾、鲍鱼这样值大价钱的。可是尽管宾主早就吃到齐脖子了,厨房里还是照着菜单子大盘大碗地往上端,许多菜几乎又被原封不动地撤了下去,不是很浪费吗?”

1959年到1961年被称为“三年困难时期”,在农民口中为“过苦日子”、“过粮食关”。据《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记载,“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但就是在这样的困难年景下,大吃大喝仍未完全消除。湖南省委1959年宴请中央有关领导,主菜是

“鸡汤煨鱼翅”。而此时全国副食产品已紧张到湖南省委有关领导为毛泽东身边的服务人员们提供一些肥皂,就已经让他们非常满意的地步。

如果说湖南1959年情况尚好,招待中央领导无可厚非的话,那么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画家巡游团”则将灾年吃喝之风暴露无遗。1960年,傅抱石成为中国美协副主席,9月25日,率领钱松、亚明等12人,赴往豫、川、鄂、湘、粤、陕六省,开始为期3个月2.3万里红色之旅。大饥荒中,各省接待并不寒酸,沿途多安排资深画家住套间、坐卧铺,乘轮船一等舱;每到大城市,必连天安排观赏戏曲、电影、博物馆;沿途游览风景名胜,接待规格基本按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全国政协、人大代表的标准,饮食较为丰盛。“画家巡游团”的组员详尽记录了记忆深刻的沿途饮食。例如,在成都杜甫草堂一装饰古朴的餐厅,四川省委宣传部长李亚群请客,龙抄手、赖汤圆、香炸金糕、银糕、肥肠粉、四川苕饼、醉魔芋、钟水饺等等,共端上来20余种小吃。初吃狼吞虎咽,后来摸着肚子喊吃不下了,但还是往上端。

相比于高级干部和画家这些“特殊人群”,三年饥荒时期的“吃喝风”在基层干部中更为严重。据某县志记载:1959年下半年有些地方社员发生断炊,过春节时连口粮都吃不上;1960年春有些地方发生浮肿病,领导还错误地认为是气候不好,不敢正视粮食问题。对于群众的疾病、死亡和死亡家属的生产生活困难没有很好地帮助解决,却大开现场会,大

●文史拾趣●

吃大喝大浪费。1960年饿死人特别严重的时候,干部还可以开小灶。有个干部烧了一块肉吃,吃完了把骨头丢在地上,农民爬到地上去捡。

“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本已形成的制度被大范围破坏。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却没能革了大吃大喝的命,公款吃喝更是一种普遍现象。江青等人被打倒后,有资料称他们的生活比较腐化,最典型的当属王洪文。1975年夏天王洪文到上海三个半月,一家五口住在高级别墅,几乎每餐都要喝名酒,经常要吃山珍海味,名菜佳肴,新鲜水果,时新蔬菜。什么鱼唇、鲍鱼、干贝、海参、蛤蜊、鹤鹑、野味,应有尽有。王洪文还经常设宴请他的“小兄弟”、亲信吃喝,三个多月就请了20多次。他以视察为名到工厂、农村、部队时,事先安排吃喝,要人家准备名酒名菜,每到一处都大吃大喝,常常喝得酩酊大醉,丑态百出。

那么,基层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有没有胡乱吃喝呢?事实上案例很多。有一个生产队,每当社员的家里来了客人,都要准备一桌好菜,当然要队长来“陪”,当然是请他来享用这自己也舍不得动筷的好菜。这队长还不是“队长”时,是滴酒不沾的。当了队长后,硬是让家家户户“请”。酒瘾极大的队长,每喝必醉,醉了则大发酒疯。那时上海产的“飞马牌”香烟,是仅次于“大前门”的好烟。队长喝醉后,往往嘴里叼着“飞马”,将一个汉

子按倒,跨上去,屁股上下颠动着,叼着烟的嘴连声喊着:“飞马、飞马。”有时候,伏在地上的,就是请他来吃喝的人。

重新审视毛泽东时代,说当时没有大吃大喝的浪费现象,绝对是不准确的。事实上,在那个时代不但有吃喝风,而且比之当下有过之而无不及。毛泽东屡次想纠正这股歪风,甚至发动群众性运动,但是最终都未能完全制止大吃大喝的现象。事实证明,单靠一个人的英明神武,单靠一两场全民运动,无法从根本上遏制官员的“吃喝风”。要让官员管住自己的舌头,让官员控制住自己的嘴,最重要的不是规定公务接待必须几菜几汤,而是要提高“胡吃海喝”的风险,用制度和监督去监管他们,让怀着“不吃白不吃”念头的人知道乱吃的后果。本质上只有权力被束缚,只有官员真正接受民众监督,向纳税人负责,才能从根本上止住“舌尖上”的浪费。如此,“吃了不能白吃”才能真正成为“高压线”。给权力一个笼子,舌尖才能有一个“嚼子”。



民国年间 如何考清华



高考的题目牵动着天下所有父母和孩子的心，看到几则关于民国大学入学考试题目的问题，颇为有趣，也颇引人深思。

第一则是 1932 年清华大学的国文考试题，题目不难，但其中有一道怪题“对对子”，上联是“孙行者”，要求考生对下联。“孙行者”大家都熟悉，不就是保护唐僧上西天取经的那个猴子孙悟空吗，可让大伙对对联，就有点难为这些莘莘学子了。据说后来只有三人答对了，他们对的是“胡适之”，“孙”对“胡”（狷狷），“行”对“适”，“者”对“之”，答案用的是时髦人物胡适的名字，十分有趣，大大出乎出题者的预料。这道怪题的“始作俑者”就是清华大学教授陈寅恪，时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导师，与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并称清华四大国学导师。当时人们都认为“孙行者”的标准答案就是“胡适之”，而且还都以为是陈寅恪有意为之，目的就是调侃一下胡适，其实陈寅恪拟定的标准答案是“王引之”（清代学者）和“祖冲之”，也确实没有调侃胡适的意思。

第二则是闻一多先生录取臧克家的故事。臧克家当年报考国立青岛大学（今山东大学）时，国文考试有两个题目，一是《你为什么投考青岛大学？》，一是《杂感》，两题任选一道，但臧克家两题都做了。他写的《杂感》只有三句话：“人生永远追逐着幻光，但谁把幻光看作幻光，谁便沉入了无边的苦海！”这三句杂感虽然短小却饱含哲理，后来臧克家在回忆文章中说：“它是我尝尽了人生的苦味，从中熔炼出来的哲理，也是我在政治大革命失败之后，极端苦痛而又不甘心落寞的一种无可奈何的悲痛消沉心情的结晶。”闻一多对此极为欣赏，从中看到了臧克家的内心世界，于是便给判了 98 分的高分，将数学考试吃了“鸭蛋”的臧克家破格录入了青岛大学。据说当年闻一多报考清华时，也是其他学科成绩平平，唯独作文文才并茂而为主考老师所赏识，这次破格录取臧克家，可能是一多先生想起了自己的经历，多多少少有点惺惺惜惺惺之意吧。

第三则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三校1946年度的联合招生国文试题。题目共两道，一是作文：学校与社会；二是解释成语的意义：指日可待、变本加厉、隔岸观火、息息相关。

与这些简洁、精炼的试题相比，我们今天的考试还能让孩子领略到学习的快乐吗？与如今那些动辄长达十余页、似是而非的高考题目比照，究竟哪一种更接近我们教育的初衷呢？

众所周知，民国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乱世，但同时也是一个大师辈出的时代，那个时期学者文人的许多文章至今仍令我们怀念不已。

柳下惠：美德远不止坐怀不乱 以说真话闻名天下



受柳下惠美德影响的人，胸襟狭隘的人也能变得心胸宽大起来，刻薄的人也能厚道起来。因此，孟子称赞柳下惠是“圣之和者也。”意思是说，柳下惠是随和的圣人。

提到柳下惠，人们最熟悉的就是他坐怀不乱的故事：天寒，有一女子来投宿，柳下惠恐怕她冻死，就让她坐在他怀中，用衣服盖住她，一直到第二天也没有发生越礼的事。

其实，除了在男女作风方面有突出表现外，柳下惠在历史上还有不少可圈可点的作为。柳下惠是春秋时期的鲁国人，姓展名禽。他是鲁孝公的儿子公子展的后裔。“柳下”是他的食邑，“惠”则是他的谥号，所以后人称他“柳下惠”。一次，齐国派人向鲁国索要传世宝鼎——岑鼎。岑鼎是鲁国的传世之宝，鲁国舍不得，却又怕得罪齐国，遂做一假鼎冒充。齐国人不知道这鼎是真是假，但他们相信以说真话闻名天下的柳下惠，就说：“我们不相信你们，只相信柳下惠。如果柳下惠说这个鼎是真的岑鼎，我们就接受。”于是，鲁国让柳下惠去说这假鼎是真岑鼎，结果遭到了柳下惠拒绝。柳下惠说：“信誉是我一生唯一的珍宝，我如果说假话，那就是自毁珍宝。以毁我的珍宝来保住鲁国的珍宝岑鼎，这样的事我干不了。”最后，鲁国只得将真岑鼎送往齐国。

坚持讲真话，绝对不说假话，这是多么美好的品格呀！可惜的是，柳下惠生不逢时，春秋时期是个礼崩乐坏的乱世，拥有说真话美德的人在现实中却屡屡吃亏。柳下惠出仕之际，鲁国的朝政把持在臧文仲之手。鲁僖公二十六年

(前 631 年)夏,齐孝公出兵讨伐鲁国,臧文仲问柳下惠说怎样的外交辞令才能让齐国退兵。柳下惠实话实说:“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应该是这样的:大国做好小国的榜样,小国好好侍奉大国,这样才能防止祸乱。现在鲁国作为小国却狂妄自大,触怒大国,无异自取其祸,怎么措辞都是没有用的呀。”这样的话当然让臧文仲很不高兴。领导不高兴,后果也很严重。柳下惠在鲁国做士师(一个掌管刑罚狱的官位),结果在臧文仲当政期间竟然连续三次被罢黜。

当时,柳下惠已经很有名了,各国诸侯都争着用高官厚禄聘请他,结果他都拒绝了。有人问其原因,他答:“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意思是说,自己坚持正直的做人原则,怎么能不被三次罢黜呢?如果我一直坚持这样的做人原则,到了哪里也逃不了被黜免的命运;如果放弃自己这样的做人原则,即便在鲁国我也可以得到高官厚禄,那又何必离开生我养我的故

乡呢?可见,柳下惠对春秋后期的乱世是有相当了解的——“道之不行已久矣”,到处都是礼崩乐坏的状况,待在哪个诸侯国都差不多。

对于柳下惠连续三次被罢免一事,一百多年后的孔子还替他鸣不平,说:“臧文仲其窃位者与?知柳下惠之贤而不与立也!”意思是说,臧文仲明明知道柳下惠是贤人却不提拔他,实在是失职呀。

对于柳下惠,孟子也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柳下惠不以奉侍坏的国君为耻,也不以官小而推辞;他做官不隐藏自己的才华,但一定按照自己的做人原则办事;他不被任用也不怨恨,遭受困厄也不自怨自艾;同乡巴佬相处,他也能高高兴兴的。他的理由是:“你是你,我是我,你纵然在我旁边赤身裸体,又怎么能染污我呢?”所以,受柳下惠美德影响的人,胸襟狭隘的人也能变得心胸宽大起来,刻薄的人也能厚道起来。因此,孟子称赞柳下惠是“圣之和者也。”意思是说,柳下惠是随和的圣人。

·名句欣赏·

【德之休明,不在位之高下】——《武昌宰韩君去思颂碑》

休明:贤明。

【所谓道德云者,合仁与义言之也】——《原道》

【麟之所以为麟者,以德不以形】——《获麟解》

以:因为。德:品德。形:外表形象。

【以德礼为先而辅以政刑】——《潮州请置乡校牒》

德礼:德行礼仪。辅:辅助。政刑:政令刑法。

【君子谋道不谋富】——《吏商》

谋道:努力于正义的事情。谋富:努力于致富。

中国最早四位女留学生的故事（二）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中国目前是世界上出国留学人数最多的国家。在遍布世界的中国学子当中,不乏女性的身影。然而,回望一百多年前的晚清时期,尽管当时已西风东渐,但女子们普遍都还缠着足,笃信“无才便是德”的观念,垂手伫立在男人的身后,至于出洋留学,那简直是传奇中的传奇。

在当时的中国,偏偏就有四位年轻的女子大胆地迈出了令国人惊诧的一双天足,漂洋过海到美国的大学去学习先进的医学知识,并且都以优异的成绩毕业,最后还都做了报效祖国的女“海归”,以所学救助同胞,服务社会。

这四位女子分别是金雅妹、许金匄、康爱德和石美玉。她们出国的时间是 1881 年至 1892 年之间,那会儿甲午战争还没打响,大批留日留美的中国学生还没出发。所以,她们当之无愧地成为近代中国最早的一批女留学生。

她们本是普通的中国女子,却有着不同常人的经历。传奇或许不可复制,但她们的故事值得我们记取。

许金匄:中国第一位国际女代表

1884 年,当宁波女子金雅妹正在美国进行大学三年级的学业时,另一个身材娇小的中国女孩也踏上了美国的土地。这个女孩来自另一个通商口岸城市——福州,她的名字叫许金匄(由于她使用音译英文名,以致她的中文真名与事迹长期被人所忽略。有的史料



大学毕业时的许金匄

称她为柯金英,也有称为何金英)。

许金匄,1866年出生于福州南台岛(今仓山)的一个基督教家庭,其父是基督教美以美会的早期信徒之一,而且思想相当开放。据说许金匄小时候为习俗所迫,一度请求她的母亲为她缠足,却遭到父亲的坚决反对。这在当时的社会是极为难得的。她恐怕是福建第一个不缠足的女孩。

有乃父,必有其女。许金匄先是求学于美以美会办的毓英女塾,因不满呆板的课程而转入福州妇女医院学医,并在教会医院服务。她天生聪慧,并富有同情心,又对医学颇感兴趣,决心学好西医,造福乡梓。医院院长十分欣赏她的志气和才华,为她联系了美国的妇女外国传道会(Women's Foreign Mission Society)资助她赴美留学。

许金匄当时只有18岁,还不懂英语,父母和亲戚朋友都不放心她远行,连一向开明的父亲也十分不舍。可她的态度却十分坚决,告别了亲友,跟随两个美国传教士离开了福州。

1884年5月9日,许金匄到达美国一个星期后,即登上了《纽约时报》的版面,报上说有一位深色皮肤、闪着杏色的双眸、穿着绣花的中国式衣裙、脚蹬绸缎便鞋的中国女孩来到了美国,并详细介绍了她的出身经历和求学计划。许金匄先是住在费城一个医生Dr.Sites的家中,学了一个暑假的英语。在这年秋季,考入了俄亥俄州的威斯利安大学(Weslyan University)。四年后,转入费城的女子医科大学。1891年,由于父亲病重,她只好中断学业

回国探望。第二年她重返费城继续学业。

两年后,许金匄从费城女子医科大学毕业,并到费城综合医院实习一年。1895年结束了在美国的求学生活,回到了家乡。亲友们惊喜地发现,当年那个富于冒险精神的邻家少女已经成长为一名训练有素、谈吐优雅、心思缜密的女医生,不变的是她那略带倔强的勤奋和乐于助人的品性。

许金匄在福州圣教妇孺医院行医,专给妇女、儿童诊病,后来还担负起了该院的主持工作。1899年她又兼任福州仓山马可爱医院(Woolstone Memorial Hospital)的院长,这样她就肩负起了主持两所医院的重任。这两所医院一在城内,一在城外,她往来奔波,很是辛苦。刚开始病人们看她是个女子,有点不信任她,不愿意到她的医院就诊。后来由于她妙手回春地医好了许多病人,很快声名鹊起,不久医院里就人满为患,拥挤不堪,要另外租房才够用。她既诊治病人又开班授课,培养出不少女医生,其中包括她的妹妹许淑匄。她还积极宣传卫生观念,并经常派出学生到乡村演讲,开展卫生宣传教育,力促人们培养良好的卫生习惯。她率先在医院使用自来水,建新式厕所,注意消毒。

1910年她的母校威斯利安大学特别授予她理科硕士学位,以表彰她的工作成就。1898年世界妇女协会在英国伦敦召开代表大会,当时主持外交事务的李鸿章闻许金匄之名,派她作为中国妇女代表,赴伦敦参加会议。她不辱使命,以流利的英语和渊博的学识展现了中国女性的风采。她是中国出席该会议的

●文史拾趣●

首位女代表，也是中国第一位参加国际事务的女代表。

1926年，许金匄辞去院长之职去南洋，三年后在新加坡病逝，享年64岁。

许金匄终身未婚，膝下无子，可谓毕生奉献于医学事业。为何在晚年孑然一身地离开祖国，选择南洋作为最后的归属地，这是一个谜。翻遍所有关于她的史料，对她个人生活的记载也是一片空白。这样一位睿智勇敢、才华横溢且相貌端庄的女子，一定有男子悄悄地爱慕过她。在生命中的某一刻，她的心中是否也燃起过爱情的火焰？她亲手迎接过许多新生命的诞生，自己却没有孩子，不知可曾感到遗憾？这一切我们都无从知晓。可是，谁能说她的心中不曾充盈着满满的爱，她把这大爱给了所有人。

中国历史上 首位外国太监

据史料记载，在元代，中国就曾有过一位外国籍的太监，而且他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外国籍的太监，名叫朴不花，高丽人，生于元朝文宗时期。朴不花在中国的皇宫内与奇洛皇后关系十分亲密，所以官职一升再升，连朝中大臣们都要巴结他，看他的眼色行事，真可谓是权倾朝野了，也光耀了“太监”的门庭。

朴不花7岁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时机他被净了身，于是被送到元朝的皇城内做了一名专门斟茶倒水、扫地擦桌子的小杂务。与他同时进宫的还有一位名叫奇洛的小姑娘，是朴不花儿时的玩伴，奇洛在皇宫里只是做一些针线活之类的工作。闲着没事的时候，两个孩子常在一块聊聊天，诉说一下思乡之苦。在宫中苦熬的日子里，两人彼此相互关怀、相互照应，生活得还算愉快。一转眼二人都已长大，奇洛出落得越发娇嫩可爱。元文宗的儿子妥欢帖木尔在游玩时发现了美丽的奇洛，并把她收进了自己的府邸。奇洛不仅人长得美，而且非常乖巧温柔，深得妥欢帖木尔的宠爱。不久，妥欢帖木尔登基，是为元顺帝，元顺帝封奇洛为二皇后。

奇洛虽然成了母仪天下的皇后，荣华富贵自然是享用不尽，但她也没有忘记自己的同乡好友朴不花，她把朴不花调到自己的兴圣宫，并迁升他为荣禄大夫，加资正院使。资政院是元朝专门管理全国财政的部门，是个可以捞银子的肥差事。既然奇洛二皇后为朴不花提供了如此好的机会，朴不花当然不会错过，自然捞得了很多好处。朴不花逐渐地积攒起了万贯家财，并且分给了奇洛二皇后很多。朴不花贪污一向都十分小心、巧妙，所以朝廷并未有所察觉，再加上非常懂得

为人处世之道，经常把一些贪占的财物送给朝中的权贵及皇亲国戚们，使得宫内宫外的人都说朴不花人好心好，赞扬声不绝于耳，比比皆是。

但是渐渐地，财富已经不能满足朴不花的欲望了，他开始觊觎朝中的权势了，要开始向政界发起进攻。巧的是元顺帝也十分宠信朴不花，经常会派他去外面做一些私访或是赈灾之类的工作，这也为他进军政界打开了便捷之门。奇洛二皇后生的儿子被立为皇太子后，朴不花又把全部的心思都扑在了太子身上，太子的吃喝玩乐全由朴不花一人亲自打理。正当元顺帝厌倦了政务、只喜好声色时，皇上不但把国之大权交给了太子，而且还任用了朴不花推荐的搠思监为宰相。这时候的朴不花早已经是权倾朝野的人物了，不管是官吏的升免，还是国策的制定，全都由朴不花一人来决策了，朴不花把朝中那些与自己不和的官员一一贬职查办，不断地排除异己。

由于元顺帝放任朴不花、搠思监等人在朝中的胡作非为，朝野内外开始动荡不安，国内的军阀势力也开始趁机起兵造反。军阀们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也纷纷参与了宫廷内的权力争斗，一时之间，天下大乱。此时的太子也早有登基称帝

之愿，见国家局势动荡不安，便想趁机逼迫自己的父皇退位。此时的朴不花、搠思监、奇洛二皇后也完全赞同太子的做法，几人便开始了策划颠覆造反的活动。就在他们依计划在排除朝中反对派的官员时，元顺帝发现了他们的阴谋，而且对几人在朝中无法无天行径的弹劾之声也是不绝于耳，所以元顺帝下旨把朴不花、搠思监打入了大牢。平日与他们有仇的孛罗帖木儿趁太子出京之际，斩杀了这两个乱国的臣子。此时军阀混战的局面还没有彻底解决，南方的朱元璋早已经开始向元大都进攻，直接威胁着大元帝国的生存。元顺帝见国家即将倾覆，不由得潸然泪下，万分懊悔地对太子道：“你们母子误了我的天下，我大元的江山毁在了你们母子的手中！”元顺帝虽然嘴上是这样说的，但他心里也明白，这一切的一切都是自己对于朴不花等人的放任造成的。朴不花死后不久，元朝就灭亡了。



紫禁城老照片

抢抓机遇 迎接挑战 不断推动我市地方志事业创新发展

3月6日,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召开了全市地方志工作会暨年鉴培训会,全面总结2010年以来我市地方志工作,并对2013年度地方志工作任务进行了安排部署。

会议由市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姚敏杰主持,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冯艳阳对我市2010年以来二轮修志、年鉴编纂、地情资料和信息化建设等方面工作进行了全面总结,并对2013年工作任务进行了部署。市地方志办公室纪检组长任昆明宣读了《西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关于表彰2012年度全市地方志工作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的通报》。市政府副秘书长周爱全作了重要讲话。他指出,近年来我市培养塑造了一支高素质的修志队伍,又面临全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和西安建设具有历史文化特色的国际化大都市这些有利时机,全市地方志系统要进一步加快二轮修志工作进度,继续保持《西安年鉴》在全国的领先地

位,进一步推动我市地方志工作取得更好成绩。他要求,全市地方志工作者要继续解放思想,不断拓宽地方志工作的新领域。

下一步,市地方志办公室全面贯彻落实会议精神,一是进一步强化各级修志人员责任意识,于年底前完成《西安市志》20个分志的总纂任务;督促指导4个区县报送复审稿,2个区县报送终审稿。二是加强质量管理,高质量地完成《西安年鉴》2013卷的编纂出版工作;完成4个区县的综合年鉴的定稿和出版,推动区县年鉴编纂工作常态化、规范化。三是加强地情资源的开发利用,做好《西安村落记忆》《西安地方志志》的资料收集和整理上报工作;协调区县做好省地情网站群建设以奖代补项目相关工作。四是加强业务培训,全年拟组织全市修志人员举办2至3期业务培训会、研讨会。

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迅速传达贯彻 全省地方志办公室主任会议精神

3月18日上午,市地方志办公室召开处级以上干部会议,集体学习全省市级地方志办公室主任会议精神,并重点学习了白阿莹

副省长到省地方志办公室调研时的讲话和省地方志办公室张仁华主任在全省志办主任会议上的讲话精神。办党组书记、主任冯艳阳就

贯彻落实全省市级地方志办公室主任会议精神,进一步推动我市二轮修志、年鉴编纂、地情资料和信息化建设等各项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提出了具体要求。

一是突出二轮修志这一重点工作,坚持总编室每月例会制度,加大对承编单位和撰稿单位的指导力度,通过开展面对面,点对点 and “一帮一”的指导方式,切实抓好志书的整体质量和进度,确保年底前完成《西安市志》20 个分志的总纂任务和 4 个区县报送复审稿,2 个区县报送终审稿工作。二是加强质量管理,高质量地完成《西安年鉴》2013 卷的编纂出版工作;完成 4 个区县的综合年鉴的定

稿和出版,推动区县年鉴编纂工作常态化、规范化。三是加强地情资源的开发利用,做好《西安村落记忆》《西安地方志志》的资料收集和整理上报工作;协调区县做好省地情网站群建设以奖代补项目相关工作。

下一步,市地方志办公室将全面贯彻落实全省市级地方志办公室主任会议精神,以加快全市二轮修志工作进度、提升年鉴编纂工作水平、扩大地情丛书服务功能,创新地方志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手段为重点,认真研究并细化具体落实措施,创新工作方法,破解工作难题,提升工作质量,确保年度各项工作的全面顺利实施和圆满完成。

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 启动《西安市地方志志》编纂工作

2013 年 4 月初,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组织市属 13 区县地方志办公室启动《西安市地方志志》编纂工作。《西安市地方志志》是市委、市政府规划的第二轮《西安市志》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市一部专业特性鲜明的专业志丛书。

西安是中华民族及华夏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先后有西周、秦、西汉、新、东汉(献帝)、西晋(愍帝)、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唐等 13 个政权在西安建都,时间长达 1000 余年,是中国历史上建都朝代最多、时间最长的历史文化名城,长期成为中国政治、经

济、文化中心,留下了极为丰富的文化遗产。以《史记》《汉书》等为代表的正史和卷帙浩繁的历代方志,成为西安深厚文化积淀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 20 世纪 80 年代新编地方志工作开展以来,在各级党委、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我市广大方志工作者不辱使命,甘于奉献,在修志编鉴、开发利用地情资源、旧志整理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编纂市方志志,旨在全面记述我市地方志事业发展的历史和现状,展示我市地方志编纂成果,总结修志工作规律,更好地发挥地方志存史、资治、教化功能,更好地为我市经济建设和社

会发展服务。

《西安市地方志志》由综述、大事记、方志编纂沿革、方志编纂成果、年鉴编纂、旧志整理、志书保存与利用、方志研究、组织管理、人物、附录、索引等部分组成。以志为主,图表穿插使用,附录、索引附后。采用篇章目体例,使用语体文、记述体。上限追溯至事物发端,

下限截至 2012 年底。该志在全面记述西安方志历史的基础上,重点记述新编社会主义地方志编纂的历史发展轨迹及编纂成果,体现地方志事业发展不同阶段的基本特征。同时突出西安地域有史以来具有文献资料价值的志书编纂成果。拟于本年度完成编纂工作,明年出版发行。

西安市第二轮修志工作培训暨区县志研讨会召开

为进一步加快我市第二轮修志工作整体进度,提高志稿编纂质量,确保目标任务顺利完成,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于 4 月 9 日至 10 日组织召开西安市第二轮修志工作培训暨区县志研讨会。市志各承编单位及各区县修志机构共 170 余人参加了培训。按照压缩会议时间及经费的要求,将培训会 and 研讨会合并召开。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冯艳阳、副主任张帆出席会议并讲话。

第二轮修志工作培训会首先由市政府办公厅、市建委和市文物局修志人员进行了经验交流发言,市志各责任编辑分别点评了各承编单位初稿撰写情况。市地方志办公室冯艳阳主任围绕初稿撰写的重要性、紧迫性和我市二轮修志工作进展实际提出具体要求。

区县志研讨会首先向各区县通报了我市区县志整体进展和当前在全省所处的地位。碑林区地方志办公室代表就志书出版需抓好

的重点环节做了交流发言,并对志书印刷出版的 6 个环节进行了举例说明。最后各区县修志机构围绕志书补遗、行政地图、资料的收集、大事记的纂写等问题做了深入的讨论。

会议第二天,以《志书的概述撰写及初稿撰写中常见问题评析》为主题,对市志各承编单位和各区县修志机构的人员集中进行了专题辅导。

本次会议时间紧凑、内容实用,紧紧围绕全市地方志年度工作目标,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长安志》校点合作协议正式签订

4月10日,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与西北大学社科处正式签订《长安志》校点合作协议,标志西安市旧志整理工作迈入新阶段。

《长安志》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古都志,北宋熙宁九年(1076)宋敏求撰,20卷。除备述唐长安城坊及宫室、第宅、寺观外,还上溯周、秦,旁及京兆府所属万年、长安等二十四县,详记其沿革、山川、名胜、古迹。对研究长安的历史地理有较大参考价值,对于当前西安的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以及实施“唐皇城”复兴规划均具有现实意义。

该志由西北大学博士生导师阎琦、中山大学文学博士李福标以及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相关人员合作校点,是西安旧志整理规划的一部分。

针对西安地区旧志资源丰富、影响力大的特点,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近几年将旧志整理作为工作重点之一。在摸清家底、广泛调研和论证的基础上,有计划地与在古籍出版方面具有优势的三秦出版社共同策划,有步骤地联合西安高校和社科系统的专家学者,对西安旧志进行整理校点。先期出版的《西安府志》(校点本)社会反响很好,今年准备出版宋敏求的《长安志》(校点本),今后几年还将校点出版《长安县志》《咸宁县志》等综合性旧志和《高陵县志》《蓝田县志》《周志县志》《户县志》《临潼县志》等旧志,进一步挖掘西安地区历史文化,为建设具有历史文化特色的国际化大都市和促进西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做出新的贡献。

《西安市水务志》暨《西安市志·水务分志》初稿研讨会举行

4月15日上午,《西安市水务志》暨《西安市志(1991—2010)·水务分志》初稿研讨会在西安市水利学会召开。

《西安市水务志》主编孙秦生就《西安市水务志(1991—2010)》《西安市志(1991—2010)

·水务分志》的编撰工作进展情况进行了通报,并就编撰中的相关问题做了说明。

与会专家对《西安市水务志》和《西安市志(1991—2010)·水务分志》初稿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该志观点正确、特色鲜明,全面系

统、真实准确、篇目合理,体例严谨,说明编撰工作用了心、费了神、下了苦,已经为一部高质量的志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希望下一步在条目要素、时间表述、语言运用和细节处理上多下功夫,力争写出一部佳志、良志。

西安市水利学会理事长、《西安市水务志》编辑部主任高双强肯定了编辑部在编撰工作过程中所做的艰辛努力,并对志书初稿中的相关问题提出了修改意见和建议,同时就志稿编撰中存在的数据统一性问题、部分篇目的处理及资料搜集等问题提出了解决方案。希望编辑部全体人员要高度重视志书的编撰工作,确保按照市水务局和市地方志办公室的要求按时、高质量地完成两部志书的编撰任务。

“羞”原指有滋味之物

甲骨文的“羞”是这样写的“一边是一个羊头,一边是一只手,这只手或左或右,位置并不固定。”其本意是手捧或举羊以进献。可见,3000多年前的“羞”,不是今天的“羞”。“羞”原指有滋味的东西,《周礼·天官·膳夫》中有这样一句:“掌王之食、饮、膳、羞”。汉代经学家郑玄解释为:“羞,有滋味者。”

这种羞,包含肉酱、果酱、鱼虾酱、烤肉、肉脯,甚至于香料香草。在祭祀或者宴会的时候,一般被盛放在名叫“笾豆”的竹木盘之上,作为调味的蘸料。

陶渊明在他的《自祭文》中说,“羞以嘉蔬,荐以清酌。”装盛美食的器具也就被美称为“羞鼎”、“羞豆”。有载如下:

(1)会意兼形声。字从羊从丑。丑,扭也;羊在丑左上角,为掩覆之形,意指从羊群中抓一、两只羊,以供膳食。本义:抓羊(供膳)。引申义:某人像被抓羊供膳那般驯顺。

(2)同本义。羞,进献也。从羊。羊,所进也。——《说文》以式法掌祭祀之戒具,与其荐羞。——《周礼·宰夫》。注:“庶羞,内羞”。按,内羞,房中之羞也。共其笾荐羞之实。——《周礼·笾人》。注:“荐羞皆进也。”可荐于鬼神,可羞于王公。——《左传》

(3)又如:羞豆(古代祭祀宴享时进献食物的一种盛器);羞膳(进献食品)。

(4)羞山鸡。楚有人误认山雉为凤凰,出重金购得,将献楚王,经宿雉死,其人不惜其金,唯恨不得以献。楚王感其至诚而厚加赏赐。见《尹文子·大道上》。后用为表示真诚的典故。唐李白《赠范金乡》诗:“辽东慙白豕,楚客羞山鸡。徒有献芹心,终流泣玉啼。”

古文字的“羞”字,从羊从丑,表示用手捧羊进献的意思。“羞”字的本义为进献食品,又指美味的食物,如珍羞、庶羞等。后来,用作食物的“羞”字多写作“馐”,而原来的“羞”字则借用为耻

辱、愧怍等义。“羞”字则借用为耻辱。

(5)假借为“丑”。感到耻辱或承之羞。——《易恒》

惟口启羞。——《礼记·缙人》

无作神羞。——《左传·襄公十八年》

杀身无益，适足增羞。——汉·李陵《答苏武书》

(6)又如：羞怍(羞耻，惭愧)

(7)因惭愧而难为情。

吾羞，不忍为之下。——《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十四为君妇，羞颜未尝开。——唐·李白《长干行》

一则贾环羞口难开，二则贾环也不在意。——《红楼梦》

(8)又如：羞蛾(美女的双眉)；羞人子(羞答答的)；羞杀人(羞死人)；羞红(因害羞而脸红)；羞脚(因怕羞而不敢向前)；羞懒(羞愧)。

(9)嘲弄；侮辱。

(10)羞答答。形容害羞的样子。元王实甫《西厢记》第五本第四折：“他急攘攘却才来，我羞答答怎生觑。”《儿女英雄传》第八回：“那张金凤也羞答答的还了一个万福。”

(11)羞不打。犹言羞答答。宋欧阳修《浣溪沙》词：“束素美人羞不打，却嫌裙慢褪纤腰。”

“羞”字深邃，还须探讨。

『清华简』再次印证《尚书》系伪作

2013年1月4日，清华大学举行“清华简”第三辑整理报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的成果发布会。该报告收入失传两千多年，被古代文献称之为《说命》三篇的《传说之命》三篇。由于内容和此前《尚书》中《说命》篇完全不同，更加印证了《尚书》系后人伪作。

2008年7月，清华大学接受校友捐赠，入藏了一批战国竹简，总数约为2500枚。经专家鉴定，“清华简”的内容全部都是古书，其中有许多经、史一类的文献，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为了更好地保护、整理和研究这批竹简，清华大学专门成立了出土文献研究与

保护中心，由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担任中心主任。“清华简”第一辑和第二辑整理报告分别已于2010年和2011年年底出版。

在本辑公布的清华简中，《传说之命》三篇非常值得关注，它就是古代文献中所提到的《说命》三篇，记述内容是商王武丁获得贤臣傅说，并让他努力辅佐自己治理国家等情况。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三篇简文的内容与东晋时期出现的伪古文《尚书》的《说命》篇完全不同，这种情况在清华简第一辑整理报告中已经出现，它再一次证明，传世的伪古文《尚书》确系后人伪作。



血气方刚 说的是中年人

“血气方刚”是个常用成语。现在的成语词典，一般把这个“方”解释为“开始”、“正”，说整个成语的意思是：形容年轻人精力正旺盛。其实，对这个“方”的解释，是一个沿用了多年的错误。

成语“血气方刚”出自《论语·季氏》。孔子说：“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很明显，孔子说的“血气方刚”是指壮年人，并不是青年人。“血气未定，戒之在色”，说的才是青年人。朱熹在《论语集注》中说“血气，形之所待，以生者，血阴而气阳也”。这就说明了，“血”和“气”是两种并列的物质。孔子说的“血气方刚”的“方”，不可能是“正”、“开始”的意思，而应该是“并”、“一起”的意思，因为“血气”不是壮年时才开始的。“方”在这里不是表示时间，而是表示范围。“血气方刚”的意思是血和气全都强盛，而不是血气才开始强盛。整个成语意思应该是：人到了壮年，血和气全都达到了强盛。清人吴昌莹的《经词衍释》中说过“《论语》血气方刚。言血与气并刚也”。

《说文解字》“方，并船也”，这是“方”的原

始义。《资治通鉴》写赤壁之战时，黄盖说“操军方连船舰，首尾相接，可烧而走也”。这里的“方”意思就是并联，就是用了原始义。后来，东西并在一起，也称为“方”，《仪礼·乡射礼》“不方足”，注“方犹并也”。《史记·苏秦列传》：“车不得方轨，骑不得比行，百人守险，千人不敢过也。”这里的“方”与“比”同义，就是并列的意思。杨树达《词诠》“方”条：“表态副词，并也。”杨树达先生认为“方”与“并”古音相同，并举出了《尚书·微子》中的“小民方兴，相为敌讎”，在《史记·宋微子世家》中作“小民乃并兴，相为敌讎”，作为二字相通的例子。

“方”表示范围的“并”这个意义，后来使用很少，而表示时间的“才”这个意义，使用较多。可能是这个原因，人们忽视了“方”表示“并”这一义项，而误解了“血气方刚”这个成语，认为“血气方刚”是“血气才刚”，而专用于年轻人了。“血气方刚”本来是用于壮年人的，并不是用于年轻人的，可是由于对“血气方刚”的“方”错误的理解，现在变成了年轻人的专利，反而没有壮年人的份了，这也是一个有趣的语言现象。



“蒙古大夫”的由来

人们习惯称那种“恶治”的医生为蒙古大夫,这蒙古大夫,就是对传统蒙医的戏称。

之所以对蒙医有这种疹人的看法,和蒙医的治疗方法有一定关系。蒙医是蒙古族的一种独特医疗系统,古代主要集中于喇嘛庙。传统的蒙医多用物理疗法,很少用药且擅长接骨正骨,(清代蒙医受到藏医的巨大影响,特别是藏医《四部医典》的传入,使蒙药得到发展,形成了自己的体系),正骨那还能舒服了?这个专科特点不免让病家畏惧三分。对于普通头疼脑热,蒙古族人很少求医,多依靠自身抵抗力,因此蒙医在这方面不接诊则已,接诊就是重病危急,养成了蒙医为了立竿见影敢于用猛药的习惯,清代太医院也用一些蒙医,但可想而知让他们按照草原下药的水准给虚弱的皇亲国戚看病会有怎样的效果。“蒙古大夫”因此成名。

因为蒙医用药较少,故此20世纪60年代有一无经验女医生下乡,曾有记载。讲到在某地被携去给一重病老妇诊断,手头无有效药,无法治疗,而周围人苦苦哀求,无奈下作

精神治疗法安慰大家,给一瓶葡萄糖加少量抗生素及安神药物,同时让众人准备后事。

不料三日后此老妇即登门拜谢而来,盖一生少用药,药物作用特别有效,竟然被治好,令大夫不解之极。由此可见,整天抱着药罐子,有病治病没病预防的说法大有问题,只怕真需要用药的时候效果就不那样有效了。

但是蒙医治疗跌打损伤有奇效,则有传奇的记载。

乾隆年间有一位翰林学士不幸坠马,休息了一天以后看来似乎无事,但是坐下手足老想往一块儿佝偻,站起来一只右眼老想往上翻。

这样的怪病令群医束手,只好上太医院请蒙医来看。

蒙医看后,说不要紧,吩咐两条大汉挟住学士,在院内转圈疾走。学士走不上两圈就哀告受不了,而蒙医不为所动,令人不得放松,照旧疾奔而行。如是一个时辰,学士几乎瘫痪,而病即痊愈。

事后问之,蒙医说这个病蒙古常见,是因为坠马的时候一页肝翻转过来了,不加治疗形成淤血是要死人的。让人挟持学士疾走,经过大运动量的折腾,把他那一页肝翻转回来,病自然就好了。

果然神技,方知蒙古大夫就是这样治病的。



春思二首

◎ (唐)贾至

草色青青柳色黄，桃花历乱李花香。
东风不为吹愁去，春日偏能惹恨长。
红粉当垆弱柳垂，金花腊酒解酴醾。
笙歌日暮能留客，醉杀长安轻薄儿。

赏析：

贾至在唐肃宗朝曾因事贬为岳州司马。唐汝询在《唐诗解》中认为贾至所写的一些绝句“皆谪居楚中而作”。这两首诗大概也是他在贬谪期间所作。这里选择第一首诗(“草色青青柳色黄”)进行赏析。

因诗题作《春思》，故诗中句句就春立意。首句“草色青青柳色黄”，直接用嫩绿、鹅黄两色春草丛生、柳丝飘拂的生机盎然的春天景象；次句“桃花历乱李花香”，用暗笔为这幅景象添上嫣红、洁白两色，并以传神之笔烘染了花枝披离、花气氤氲的浓春图景，使画面上的春光更加艳丽，春意更加喧闹。诗人在这两句里写足了春景，其目的在于为下面抒写深愁

苦恨作对照。

后两句诗转入写诗人的愁恨。这种愁恨深深植根于内心深处，是不会因外界春光的美好而消除的。南唐冯延巳《鹊踏枝》词中“每到春来，惆怅还依旧”两句，就是直接写出了这一事实。但贾至没有这样直写，而是别出奇思，以出人意料的构思，使诗意的表达更有深度，更为曲折。诗的第三句“东风不为吹愁去”，不说自己愁重难遣，却怨东风冷漠无情，不为遣愁。这在诗意上深了一层、曲了一层，使诗句避免平直。第四句“春日偏能惹恨长”，不说因愁闷而百无聊赖，却反过来说成是春日惹恨，将恨引长，如此立意显得新奇巧妙。这首诗因春景而兴愁恨，诗中所表达的愁恨，并非一般的闲愁闲恨，而是诗人被贬荒地后产生的流人之愁，逐客之恨。所以，尽管春光明媚，但这愁恨却不减丝毫，反而愈益地难奈难遣。